

# 无边的仇恨

长中岛机中中糖工厂厂史国荣史编



www.duxiu.com

无：

长辛店机車車  
楊逸

史編委會編  
圖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单隆福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业

字第09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印张：2 7/16·总頁2·插图：4·字数：51,000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統一書号：10071·527

定价：（6）0.33元

## 前 言

长辛店机車車輛工厂是一个有六十年历史的老厂。这里发生过震撼全国的“二七”風暴。厂里的老工人，永远記得在敌人铁蹄下的深刻的民族仇恨与阶级仇恨。几十年来，他們在党领导下前仆后继地向敌人作过无数次的斗争。每个老工人的记忆里都有不少生动的、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为了編写厂史，我們曾广泛地向全厂工人征稿。当时，各車間編出了几十期厂史墙报，工人写来的稿件有三千多篇，大都是記述各人亲身经历的短篇故事。我們的厂史命名为“北方的紅星”，已經出版了。但是，厂史的容量有限。往往一件事情有許多人写来的回忆录，就只能选用一篇或者綜合叙述，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就不可能容納。因此，我們現在由工人群众亲手写的这許多回忆文章里，再选出这样一本。这本书是工人的回忆录选集，不是按厂史中的大事編选的。写稿的多半是中年的工人，因此内容以記述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事情为主。各篇按時間順序排列。至于更早一些的“二七”斗争，因重要材料已編进“北方的紅星”内，所以只选发了一篇“二七”老工人的回忆录。党领导工人进行系統的斗争的史实也大多在“北方的紅星”里讲述过了，这里只收輯了两篇小故事，和“二七”回忆放在一起，专为一組。

这本书的写作者，大部分都是从来没有写过文章的人。

是过去的苦难生活在大家心里留下忘不了的仇恨，才令他们提起笔写下这些文章来，这样的仇恨促使大家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更加热爱。我们相信，这些苦难的回忆给予年轻读者的将是奋发鼓舞的力量。

至于解放十年来工厂里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那是像万朵繁花一样，我们已经将厂里先进人物的故事另外编选成“老树红花”一书，就不包括在这本回忆录里了。

編 者

1959年2月

**統一書號：10071·527**

**定 價：(6) 0.33 元**

目 录

團处长.....	1
追緝查.....	3
上工难.....	6
宪兵队.....	10
无边的仇恨.....	12
老孙绝技要鬼命.....	14
中国人不好惹.....	17
跳車.....	20
我們怎样給日本鬼干活?.....	24
我的学徒生活.....	26
額外員工.....	31
逃兵.....	34
逃王八.....	38
电蜡惹禍.....	41
落車.....	46
忘不了的仇恨.....	48
“二七”回忆.....	53

地下的斗争.....65

岭南工作队的故事.....71

## 圍处长

王貴宗說 李生义記

鈕孝賢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当长辛店机务处处长，直接管咱們工厂。那工夫，十个月倒有九个月不开支，有时候給一块两块的还不够塞牙縫的。工人干瞪眼，不是盼米，就是盼面，欠的債頂着屁股門儿，也沒法还賬。可还是餓的肚子咕咕出响。

大伙儿常找鈕孝賢，跟他要工錢，他老是搖頭摆尾巴地不听。后来，大伙把他找急了，就发下来一批“欠薪券”，这欠薪券印得滿漂亮，上面紅紅綠綠地印着拾元、貳拾元……，可是也只能拿到手里攢着，什么用处也沒有。一个月有时对一次号碼子，可一千張才对上三两張，簡直是要他媽的鬼把戏。

大伙儿心一齐，就决定給他来个硬的，学着“二七”那么干。有一天，餓得我只有在厂房里蹲着，忽然听到有人喊：“圍老鈕去呀！”“要工錢去呀！”等我跑到鈕孝賢的办公大楼前面，喝！已經来了一千多人，大伙儿把他的大楼圍了一圈，里三层外三层成了人粥，有的就喊：

“要餓死，咱們就死在一块儿，你也甭活着！”

“叫他也尝尝挨餓的滋味！”

鈕孝賢也不敢露面，派他手底下的人常探头探脑地隔着

玻璃窗往外看，大伙儿也不理他们。有的就坐在地上，有饿得受不了的就躺在地上。

快到中午时，从楼前头出来一个人，这人一見大伙儿就忙摘下灰礼帽，忙着点头，还没容他说什么，这边就喊：“把他拉过来，敲打敲打。”“替处长讲情来了吗？”那家伙憋着张嘴，屁也没敢放，赶紧就又缩回去了。

中午，大伙就轮流去吃饭，也让鈕孝賢手底下的使唤人随便出来吃饭。但是，进门时都要检查，怕他们给鈕孝賢带进吃的。

不一会，有一个楊总管迈着小碎步，蹦达蹦达地来了，大家一看他那德行，就火了。他走到门前，假装温和地说：“诸位师傅，我找处长有紧急事……。”“办公事我们不管，先翻翻他身上。”一个老师傅说完，几个年轻的小伙子上去一下就翻出两个馒头来，大伙非要打他不行，他见事不妙，赶紧拍打着屁股溜了。

下午，医院的馮大夫提着药包来了，到门前满脸陪笑地说：“处长不舒服，我我来看看。”大伙说：好，我们先搜搜吧！把药包一解开，露出了三个大馒头，有人就嚷：“给他吃姜！”馮大夫一見苗头不对，忙向大伙抹稀泥：“嘻，嘻，回见……”有人就说：“你不是给处长看病吗。”旁边的人代答道：“哼！处长病好了。”

鈕孝賢在里边可傻了眼，饿得干着急也没法子。足足呆了一天，一看工人纹丝不动，这才不得已和工人讲和，最后鈕孝賢答应三天之内开支。

后来交通部一看他胆太小，就把他刷了。又换了一个处长。但，那工夫是一个倒了，换另一个也不行，都他妈的兔子尾巴——长不了。

## 追 緝 查

尹桂田說 李生义記

一九二九年国内軍閥爭权夺利折騰得真叫欢。那时候，鐵路局三天两头換局长，姓关的沒当三天半，又換了个姓周的，过两天又来了个姓刘的，还有什么何局长、謝局长，唉，簡直够背半天的。

这一来，咱們干活的工人可倒了霉，常常几个月不开支！本来作工的就够穷的，这下子可就更苦了。

記得那年夏天，庄稼地里的高粱长得有一人高了，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工厂里也不給工人开支，大伙就圍在一块儿聊大天儿，厂房里一点响动都沒有，总管工头也不知道全藏到那儿去了，全不敢見工人。

一天，我看見从鐵路局派来的陈緝查进厂房里乱逛游。我想，到日子不开支，你他媽的还查什么！等他走后，我跟大伙儿一商量，大伙都說：明天他再来就把他圍住，跟他要錢，他不管咱們就砸他。

这下子我心里可注意上了，等到第二天，大伙儿照常圍着聊大天儿，一个老师傅正咳声叹气地說着工人刘亮丢驴的事儿，我抬头冲北門儿一瞧，那位陈緝查果然又来了。我站起来連忙大喊：“他来了！”我这一嗓子不要紧，凡是在厂房里聊大天儿的工人都忽拉下子站起来，朝他那边跑去。

只見那位陳緝查正跟過去一樣，胳膊上帶着紅箍兒，腰里挎着手槍，迈着四方步，正大大方方地往里走。冷不丁一瞧人都朝他這頭兒來了，一下子就給吓楞了。有人就沖他喊：“抓着他！別讓他跑萎！”“不开支你查个屁！”快把他拽着了，他才覺得事不好，扭頭撒丫子就往回跑。他一跑，大伙就更歡了，連喊帶追一下子更熱鬧起來。龍車房這邊一嚷，破車場那邊聽見，也都跑來了。好傢伙，足有四、五百號人，聲勢更大了。這一來，這位陳緝查可傻眼了，腰里的手槍也不管用了，光顧跑，一拐彎連鞋子掉了一隻，他也顧不得揀了。這樣他一氣兒跑到老車輪場那邊一間木房前，他想鑽進公事房，找个工頭、總管的撐腰，可抬頭一瞧不是公事房，跑錯了，又扭過屁股跑，當時就把這小子給吓蒙了。

他鑽進公事房，大伙兒可也就把房子圍上了。有人喊：“是小子出來！怕什麼！”也有的喊：“把他揪出來揍他一頓。”喊聲真叫大。在鉗工案子上干活兒的有個楊和尚，是位“二七”老工人，這個人敢說敢做，他在那小公事房門前扯着嗓子喊：“有種的你出來，誰有理沖着老爺兒（太陽）說說。”又加上大伙不住地喊，那小子在屋裡一听，可沒了轍，就賊毛鼠眼、戰戰兢兢地出來了。等他一出來，咳！臉都成白腊了，他對着大伙兒結結巴巴地說：“兄……兄弟們！饒我一命吧！我……我這就去鐵路局，給大伙兒辦理去……。”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來！”

“天下烏鴉都是黑的，你別他媽的裝蒜了！”大伙兒咬牙切齒的，誰听他那鬼話。

到末了，還是楊和尚給他解圍了。老楊指着那小子鼻子尖說：“你說話可要算話，別跟你們局長學，說話還不跟放屁！”

那小子一听连连点头说：“君……君子一言，快……快馬一鞭……。”

“那我們就先饒了你这一条命，要不来錢，小心你的脑袋！”說完老楊用手使勁戳了他一下。大伙儿总算出了气。再說，这小子也答应了，大伙才慢慢地回去接着聊大天儿。

过了两天，还真灵，我們每人真都領了三块錢，总算沒白追。

这回那小子可叫大伙儿給吓了一场大病，差点沒要了狗儿的命。打这往后，也看不见他了，不知滾到那儿去了。

## 上工难

郝金山說 齐振环整理

“二七”以前，我父亲在工厂当杂工，干了十多年才叫学給鋼板打眼。那时一个月挣九块钱，干了二十多年也没涨过一分錢。可我們家有十好几口人，就指着这九块钱那够呀，没办法，只好忍着。

有这么一回，我父亲刚刚开支就說：“咱们这个月勒着点褲腰带，省出点錢，好給工头送点礼……。”就在那个月，我們一家子人一天只吃一頓飯，为了給工头送礼，只好这样干。这样在月底时省了点錢，給工头买了猪肉送去。过了两个来月，还不坏，給我父亲一天涨一毛錢，这一来家里比前些时强点，可这时孩子一天天长大，飯一天天吃得多了，家里的錢还是轉不开……。

我在十三岁的时候，家里开了一个小糖豆摊，这个买卖說起来很可笑，别的摊子是“摊小利薄、概不赊欠”，我們那个摊是“摊小本薄、专做小孩买卖”。这一說，你就知道我們这个摊子有多大了。

家里人連飯全吃不上，更談不上拿錢供孩子上学，我只好在家哄弟弟妹妹和做我們家这个“买卖”。

弟弟妹妹一天天地长大了，他們不能上学，只好跟着我学做“买卖”，可这买卖又用不了这么多掌柜的，我只好另找

吃飯的道儿。

这时我已經十五岁了，父亲就去托人、讲情，要把我送进厂做工。可是那些管事的先生們全像衙門里的老爷一样，沒錢是不能进去的，甭說大总管，就連总管家中一个管家的，看見你托总管来給找事时，也得卡你一下。反正“沒錢是不过火呀”。后来又送了礼，我总算进工厂当了一名短牌工，一天掙三毛錢，一月有两个礼拜天不給錢。

我进厂就在破車場的台車班干活，管我們的头姓胡，天津人，长一臉麻子，人們当面全叫他胡头、胡爷，背后就叫他胡大麻子。

胡大麻子是大学認識不了几个，手艺也沒有，全仗着后腰硬，在工厂当了个头。这个家伙一天到晚淨算計人，在工段中他有三亲六友，誰要是拍得好，哪怕不干活总呆着，他看着都高兴。誰要是不送礼，只要一呆着，叫他看見就得“罰两毛”。短牌工要是不送礼，一辈子甭打算改长牌。

当时工厂中，工人給那些經常收礼的工头編了一段順口溜說：

薄包李，  
小菜股，  
康祥的月餅好几斤，  
赵瞪眼的德国緞子明又亮，  
不如宁二猪肉吃得香，  
王大杆的白薯两大筐。

.....

可我呢，我們家只有父亲和我掙这十来块錢，家里人吃飯有时还轉腰子呢，那有錢再送礼呢。就这样，我这短牌工

干了两年还没换长牌。

这年离中秋节还有十几天，离开支只有五六天了，我正在干活，胡大麻子晃晃悠悠走到我跟前，操着一口天津腔，跟我說：“郝金山，你这小伙子，干得不坏呀，赶明我給你换个长牌吧。”

“謝謝胡大爷。”我一听他要給我换长牌，心里可高兴了。回到家里，我跟我父亲說，我父亲也挺高兴的。

可过了两三个月，胡头也没理这个碴。有一次，我碰見胡头，問了問：“胡大爷，我改长牌的事，您看怎么办呀？”可这个家伙这一次一看见我就把臉一仰，待理待不理地說：“忙嘴的？你自己的事，你还不知道？”当时我一想也就明白啦，他們这些人，哪会輕易給一个工人改成长牌呢。

这天吃过晚飯，我就跟我父亲說：“爸爸，您看咱們是不是买点东西給胡大麻子送去，要不……”

“唉！咱們哪有錢呀？”爸爸說完話，低下头去了。

“要不給他买点什么送去，我就是再干两年也改不了长牌。”

“好，买吧，大家再勒着点褲腰帶。”呆了有一袋烟功夫，父亲說了一句。

在当月开支后，我就給胡大麻子买了点点心送去了。說也怪，这“点心”真管事，第二天他就叫我說：“金山，你出去会儿，照相去吧，回来好改长牌。”我一听心里很高兴，赶紧出去就照了相片。

可是，又过了两个月，还是沒信息。这时正好快到阴历年，我知道，这个年我要是“拜”不到，我这个长牌，也还是难改呀。

腊月二十九，我又給胡头买了“年货”送去，当时問了一

声：“胡大爷，我这个长牌……”

“好，好，已经报上去了，过年就行了。”

就这么着，过年后，我才算改成了长牌。

## 宪兵队

關炳章

在日本占領时候，我每天总要路过日本宪兵队門口去上班，当路过时心里总打着顫，提心吊胆。恐怕一点不如狗崽子們的意，就要惹場大禍。一九三九年一月九日，我和每天一样，走过宪兵队門口，剛走不到一百米远，忽然听后边日本宪兵的喊叫声：“嘟，嘟……”我連忙往后一看，三只肥大的日本狼狗，張着大嘴，齐向我跑来。当时我头忽地一热，惊慌失色，拔腿直向前跑。但由于心慌极了，实在也跑不快了，霎时间三只狗一齐追上了我，一个劲地狂咬，一只花白色的洋狗咬着我一条腿，另外二条小牛似的黄狗冲上我的头、胸部，当时我急得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只有边掙扎边喊：“为什么咬我，快救人来！来呀！救人哪！……”这时我的棉衣服已撕得不成样子，狗崽子們却站在門口拍手欢笑，我更是又气又急，但一点劲也使不上来了。这时我忘掉了一切，只見地上有石头，順手我就捡起个大石头，向一只花狗的头上摔去，一下打中了它的腿，这只狗就倒在地上，其他二只黄狗也吓回去了。我趁机会就往前直跑，剛跑出几步远，回头一看，两个宪兵带着两把雪亮的刺刀也奔我追来，喊着：“兔崽子，你的站着……”轉眼工夫，他們已追上了我，一句也不問，先向我头上打了一枪把。随后又刺了一刀，当时我就昏了。

血不知从什么地方流出来了，人倒在地上了，这时狗崽子又用绳子捆上了我，把我拉到宪兵队里去。当时我已不知人事了。一会醒了过来，又挨了一顿鞭打，并且又叫他们的狗再狠狠地咬了一顿。这时我已不成人样，棉衣服都撕得乱七八糟，满身是血，昏迷在地上。醒后，不知什么时候，狗和狗崽子们都到屋里去了，我静静地呆了一会，一个汉奸狗崽子又出来了，一把揪着我，问：“你说，你兔崽子干吗要打死我的狗，快说，快说……”当时我忍不住气愤，只说：“我上班去也没惹到你，为什么你叫三只狗来咬我呀？”这汉奸宪兵一听这话，就瞪起眼睛，骂：“你好大胆子，你打死我的狗，你也活不长！快给我站起来，把你那狗皮扒掉！”说着顺手又是一拳头，我当时忍耐着极大的痛苦，才勉强站了起来。这宪兵又嚷道：“快给我下水去。”这时正是三九寒天，滴水成冰的时候，他们把我推进了水中，我身上满是伤，一到冰冷的水中，这个罪过，哪是人能忍受的？那苦楚叫人难以形容。不但这样，还叫我蹲在水中，只露着头，再用草盖在我的头上。冰冷的水扎我的肉好象刺刀戳的一样，我透不过气来。心想这样下去，也是死呗，不如和他拚一拚，但是一动也动不了。直到把我弄得半死了，才放了我。这场遭遇，我是一辈子也不会忘掉的。

## 无边的仇恨

申又仲

日本鬼子在中国的时候，我被日本警务段抓去过一回。

这警务段是专门揍工人的地方。里边有木笼狱室，就是一间小黑屋，里面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又小又窄，不管逮多少人来，全都押在这个小黑屋子里，拉屎撒尿全在这里。旁边审讯室里，各种刑具一应俱全。

除了警务段以外，还有宪兵队，那里有个洋灰池子，挺深的水。他们把工人抓来，不问冬夏，就往水里一推。

我那次被抓走，自己说不上是为了什么“罪名”。就有一天，库房里的扁铜丢了，我那天正是夜班，对这事一点儿也不知道。第二天上夜班，有一个外号叫撅嘴的日本鬼子，就把我叫到一个小黑屋子里，没问青红皂白，到那儿就把我捆上了。夜里十一点多钟，把我送到警务段，到那儿后，一问说不对，就又把我把转到宪兵队去了，到了宪兵队，把我头朝下绑在一个梯子上，然后把梯子放进了一个三尺多深的洋灰池子里，就这样呆了有四、五十分钟，我早就昏过去了。然后鬼子们又用草纸慢慢把我熏过来，接着又用刀背砍我的腰；压合娄（压杠子）。我不知昏过去了多少次，他们叫我承认，我能承认什么？就对他们说：“我把火车头用筐挑回家去了。”

以后又把我转到二分所，到那儿以后，就给我钉上镣了，

过堂时跪在磚头上，問我：“偷了什么？”我說：“什么也沒偷。”这时啪又打了我一个大嘴巴，这一个嘴巴打得我立刻鼻子嘴都冒出了鮮血。“再說沒偷！”又是一个大嘴巴，紧接着又把我轉回警务段。

到了警务段，又灌凉水，又过电，还往鼻子眼儿里灌辣椒面，呛得鼻子里直往外流血。这刑完了以后，接着又往指甲里釘竹劈，釘进去以后，还叫往地下戳，直到扎透为止，当时疼得我死去活来，汗唰唰地往下流，又昏倒在地上。后来又綁上我的两个大拇指，吊在房梁上，大拇指勒的像鸡蛋一样。这样收拾我，他們还觉着不解气，接着又点着蜡，往我身上燒，燒得我身上吱吱地直冒油，当时我喊得都不象人声了。到現在身上还有好多伤痕。挨的打，那就更沒数儿了，只要是他們不高兴，拉出来就审审，一审就打。

在那儿押着，昼夜不让躺着，大声說話都挨揍，家里送点儿吃的去，他們就卡下。后来才托人保出来了。

## 老孙绝技要鬼命

孙茂森说 孙玉笔记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天儿特别冷，西北风刮得电线壶儿老是嗡嗡地山叫。我穿着那件唯一的四冬没拆洗过的“花儿”棉衣，大清早往工厂里走，冷风跟小刀子刺着肉一样，冻得上牙跟下牙不住地打架，身上就跟过电似地一个劲儿打哆嗦，我只好一口气跑进工厂。到了我那干活地方——客車場的轉盘道，刚想攏火烤烤，日本工头立刻逼着我开车干活。心里那气儿直往上攻，可是没法对付他们，就跟他磨蹭。磨蹭了半天，刚开开车，又来个日本工头让我先给他干点活。这小子叫进腾，他不是直接管我的工头，可是这小子特别横，一来就跟我缠着他那脸横丝肉，恶凶凶地叫着：“快快的给我干活！”我一想，你们有多少“上司”要我侍候？还要先给你干活？这不明明想我打吗？我就说：“我的活先干！”他一听我不给干就叫唤起来了：“八格牙路！什么你的活儿？我的先干的有。”我听着真不入耳，就没好气地说：“你的先用的不行！”这小子一听我挺冲，野性子立刻发作了，上来就给了我一个嘴巴。这下我没注意让他打上了，我的火儿也立刻点着了。我年轻时候学过拳脚，要真讲打，他哪是我的对手？正当他第二下打来的时候，我急了，一伸手就拦住了他打来的胳膊，这小子的胳膊让我给接开了，下边就是一脚，照我的肚子踢来，

我把身子一側，一伸手就把他的腿給抄住了，我稍一用勁，就象抓小鸡一样把他提起来了，使勁往旁边一扔。只听“砰”的一声，进腾就跟死狗似地头朝下栽到轉盘道下边去了。这时我的怒火正旺，心說：非得让你们日本人也尝尝中国人的厉害不可！我刚想再去打他，他就爬起来拿了个鉄棍又奔我打来了。我一看他手里有了家伙，我是赤手空拳，硬打准得吃亏，我就来了个巧撒腿，往南边跑，果然这小子挨了打不死心，拚命地奔我追来。我跑到一个空場上，他也快追上我了。我回头一看，他正把鉄棍举得老高，狠狠地向我脑袋砸下来，这小子連吃奶的勁都使出来了。我呢？就輕輕一轉身。他的鉄棍就打在地上了，由于他使勁过猛，鉄棍往地上一砸，震的这小子手直甩，棍子也拿不住了。这时他的火更大了，紧跟着又飞来一脚，我又一偏身子，把脚躲过去了，順手在他腰眼儿上打了一拳。說实在的，这手我从学会了，始終沒用过。因为这一下打上，准得让挨打的吐血！进腾挨了我一手絕的，立刻就軟了。可是当我在利材場小屋坐下来想歇会儿的时候，出乎意料的，我們一队的穷哥們老田和老楊跑来了，只見他俩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儿，急呼呼地說：“茂森！快——快躲——躲。进腾拿大刀来了！他要砍了你！”我一听，挺納悶，这小子还有勁啊？真是不要命了！这时再躲也来不及了，我就跟他俩說：“不要紧！今天我跟他拚了！”他俩还想劝我躲开，可是进腾这小子已經“呼吃呼吃”地跑进来了，見我二话沒說，上来就是一刀。我一轉身就跳到外边来了，这小子追出来又是一刀，这时我飞起一脚，正踢在他的腕子上，大刀当啷一声飞出去了一丈多远。我看他的相儿，活象挨了一錐子的皮球，气儿快泄光了。可是这小子死皮賴臉地沒个完，刀扔了又用脚来踢我。我看他真是屬狗的

記吃不記打，我這回可要下絕情了。把他的腿抄住以後，用力一提，又把他擗到平地上，沒等他起來就騎到他身上，揀起他的大刀就想砍了他。刀一舉……，可是我又想：當場殺人准了不得，立刻又把刀翻過來了，用刀背在他脖子上砍。要說這小子還真不含糊，只听他絕望地咕噥了句：“死了死了的好！”可是我却扔了刀，用拳頭狠狠地打起來，正打得起勁，只听見老遠有人喊：“別打死進騰！”我抬頭一看是日本人富士、清木等三人走來了，我想這下子壞了，這三個工頭看見了，一定得找麻煩，怎麼辦呢？我心一橫：對着進騰狠狠地在那勁兒地方打了一拳，就是說送命的一拳，這一拳准讓他活不了三個月。打完我就起來，準備跟這三個工頭干了。可是這三個滑小子沒敢上跟前來就溜了。

我想這回大禍是惹下了，日本人一定不會饒我。可是跑嗎？跑了也得餓死，干脆硬着頭皮干吧！遇見啥再說啥。過了幾天，進騰真的按照我的“拳頭勁兒”，大口吐血了，沒出一個月就死了。

進騰死了以後，我覺得事情更不得了了。不定哪天准得倒霉。可是一天天地過去了，日本人連個屁也沒放。打這兒，鬼子的脾氣兒讓中國人摸着了，他們是軟的欺硬的怕，打了他們也是沒事兒。以前誰也不敢惹他們，打這兒，工人們胆子就壯起來了，在工廠打日本人的事也漸漸地多了起來。

## 中国人不好惹

李 福說 董蔭有記

要說鬼子侵占咱們工厂的时候，我們工人真是牛馬不如，不給吃穿不說，小日本对中国人是想打就打，想罵就罵，还不許你吱声。这种亡国奴的气儿，每人都憋了飽飽的一肚子，你說这气能老憋着嗎？老憋着还不憋炸了哇？后来我們到一定时候，就得放放这种气儿。

記得在一九四一年夏天，有一次李照玉干着活，稍微一錯眼珠，跟別人說了句話，正赶上日本工头富崗轉过来了，这小子二话沒說，过去就打了李照玉几个嘴巴，李照玉岁数小，挨了打直掉眼泪，可是富崗这小子还是“叭！叭！”打个沒完。我在老远看着，气得眼珠子直冒花，手直冒汗，最后实在受不了那种气，挽起胳膊就想去打抱不平，揍这小子一頓。可是这当儿，富崗这小子溜走了。我只好忍着气，心里說：“馬勺还碰不着鍋沿儿？”咱們“騎着毛驴看賬本”；走着瞧！早晚让你也得碰个硬的！

又过了几天，小鬼子富崗真地找到我头上来了。我剛干完一件活，去跟旁边床子的工人說了几句話，这小子搖頭摆尾走到我跟前，神气冲冲地說：“你的溜达的不行！”我說：“我的沒有溜达！”他見我挺冲的不在乎勁儿就急了：“八格牙路！你的不干活，我的三宴的給！”說着就給了我个大嘴巴，

这下子正打到左脸上，这小子手真黑，打得我直发热，这回我可气炸了。心说你小子敢打我？好！我把右手从口袋里拿出来，立刻用力地就给了他一个大耳光，打得他扑的一下，身子晃了两晃，差点没摔倒。可能是我打的劲儿太猛了，他翻了白眼就溜进办公室去了。

没多大工夫，日本主任哇田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我一进办公室门，只见哇田在上边坐着，富岗站在一边，拿着一个大棒子，看他们那副狰狞相，我知道一场恶斗就要发生了。因为我根本就不在乎他们，他们敢打我，我就跟他们拚，反正他们怎么也落不了好，凭我这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干不过他们？

我还是一点也不在乎地往屋子当中一站，准备应付他们。哇田见我双手叉腰，气势凶凶地站到那儿，摇了摇他那小头壳，看了我半天才说：“你的敢三宾的给富岗？”我说：“他的三宾的先给我！”富岗这时眨巴着鼠眼，想说什么，可是哇田这个老滑头，向他摆了摆手，他只好放下拿着的棍子，滚出去了。哇田又跟我说：“以后不许你三宾的给人！干活大大的好人！”我连理也没理他，从容地走出了办公室。

打这儿以后，富岗对我就记上恨了，平常老想找我的碴儿。一天我正磨一块月牙板，富岗过来气呼呼地抢过去，量了又量，看了又看，忽然把月牙板一摔，说：“坏了坏了的有！”我那会儿，真不想理他，就一甩手躲开他了，可这小子像抓住什么似地追过来，还教训我似地说：“你的大大地破坏！”说着就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心想你他妈懂个屁！纯粹是鸡蛋里找骨头！你还想打我，真是“耗子舐猫鼻”死催的！我见他第二脚又踢来了，双手一攏就给他拿住了，我再使劲往高一抬，就听叭的一声，他摔了个四脚朝天，摔得这小子

“吭吃”了半天，才爬起来。这回他又沒占便宜，可是有了上次找主任碰釘子的經驗，他这回干脆就跟我拚命，瞧他跟餓狼見了食似地照我扑来，我心說：来就来，这回我非得好好教訓教訓你不可！

我看他有点气蒙了头，手脚乱打一气，我心里明白，你越生气越打不着我。可是我却用足了勁，左右开弓地光打他带响的嘴巴，那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勁。沒打上几下，就見他臉上、嘴里、鼻子里直流紅的。可是他死不认头，他不停手，我也不嫌不解气，就打个沒完。在这功夫，工人們怕把事鬧大了，就都拥上来拉住富崗，我也被迫罢手了。这时候，富崗挨打的事很快就傳出去了，立刻来了好几个日本人，把我又拉到办公室去。这回还没等我跟他们拚，他们就七手八脚地把我捆上了，我不住嘴地罵他們，他们就狠狠地打了我一頓，后来就送我到警务段去了。

在警务段里，他們硬說我是八路，天天审問拷打我，可是我除去罵他們以外，什么也不說，弄得他們一点办法也沒有，押了我半个月，才把我放回来。

## 跳 車

孙德祥說 張鉄桥整理

提起我头上的伤疤，就想起了过去。摸着伤疤，不由得我就痛恨日本鬼子，我忘不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的那些日子。

那是在一九四五年，阴历正月二十三日，早晨八点钟，我正在修机场干活，警务段的活阎王——王玉杰和牛博林，从外边就直奔我来了，走到我跟前二句话没提，用手枪把我一逼说：“走！跟我上警务段去！”我心里说，去就去呗，心里无愧，到那儿也不怕，我放下工具，跟着他们就出了东门儿。

道儿上走着，这两个特务随走就随跟我說：“据情报說，你勾通八路，是不是？你这小子思想不良！”我知道，日本鬼子和特务，要給中国人加死罪都是这么說，当时真象一条毒蛇咬住了我的心，自己知道不得了了。

我想，这话从哪里来？我弟弟孙兆武是共产党员，不久前从解放区到长辛店来活动，到我家来过，莫非他们知道了他……。

特务們押着我先奔我自己家。走到我家門口，这两个特务一窜就进了屋。他们进了屋，像一只饿急了的老鼠，东张西望，翻箱倒柜，把屋子里弄得个乱七八糟，这儿也看，那儿也看，看了个够，觉着没什么可拿的。偷儿不脱空啊！就把

我家的空粮桶、空煤油桶、拔火桶、勺子、水杓等，說是我偷来的，全要拿走。这时我刚想說話，啪啪啪一連串儿左右开弓，打了我几个大嘴巴子，“快走！他媽的！”把我家的孩子大人全踹倒在地上，我孩子惨叫痛哭把我送出了門口。

到了警务段，就升了堂，上得堂来沒問青紅皂白，就狠狠地先用皮带揍了我二十多下，打完就問：“你是不是勾通八路？”我不言声。这时警务段长和特务們更紅了眼，嘶声吶喊地說：“把他捆起来！灌他！”这时把我綁在美人床上，然后特务們拿起了大鉄壶，往我嘴上、鼻上、眼上乱澆，当时我只是个普通工人，本来就不是共产党。并且我想：就是死，也不能跟日本鬼胡說什么啊！他們把我灌得死去活来，还是逼不出口供来，弄得日本鬼子和特务們也沒有一點儿轍了。

实在沒办法了，就把我送进了小黑屋，我进去一看，这个小黑屋里一共八个人，都是咱們厂的工人，他們也是无故被抓来的。在小黑屋子里，每天只給二个高粱面小窝头吃，吃了以后，連屎都拉不出来了。

第十四天晚上，把我們八个人都带到了办公室。办公室里，挂着一張日本天皇裕仁的照片，旁边貼着乱七八糟的标語。一会儿，日本特务大蒲从套間里走了出来，对着我們大声說道：“你們八个的通通的开路！跑了跑了的不行！跑了的死了的有，八个的塘沽的干活！”

王玉杰为了討好主子，又重复了一遍說：“听見了沒有？太君让你们土塘沽，誰也别想跑，跑就揍死你們！”說完就給我們帶上了手棒子，两个人一对，我和張学价綁在一起。剛剛綁好，电话来了，鬼子說：“通通的回去！今天不走了！”

上塘沽那就是要到日本国当劳工了。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淨琢磨怎样逃跑的事儿。反正我不能叫鬼子弄到日本

国去。

第二天，也就是阴历二月初七，天还没亮，特务们又把我们的绳子紧了紧，就叫我们走了出来，特务王玉杰、牛博林和鬼子伊藤在后边押着我们，手都扣着盒子枪的扳机。

我走出了警务段，一眼就看见了山坡上的大水塔，水塔下面就是我的家。我对我的家是多么留恋呀！我走了，家里的老婆孩子还不知怎么活呢？我小声对大伙说：“看看水塔吧！咱们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呢？说不定就死在外头了。”大伙都这么安慰：“走吧，有命就回得来。”

特务们吆喝着我们上了火车，我们八个人挤在一个三等卧铺车厢里，几个特务坐在门口看着，不一会儿，就到了前门车站，紧跟着，就上了去塘沽的火车，我们坐的是最后一节车厢，车里装得满满当当，都是从京东抓来的劳工。特务们这时把手棒子给我们摘了下来。车厢里，有两个日本鬼子、十来个警察，手里都拿着枪，王玉杰交代完了以后，就走了，我这时偷偷地把绳子解了下来……

在车厢里每人发了一个馒头、二支香烟，当时我心里想：吃了吧，呆会跑好有劲儿，我把这话又告诉了别人。

八点多钟，火车从北京开了；这时我的心里乱蓬蓬的好似刀割锤打。我透过车窗，看见了闪闪而过的树木、田野、房屋，我又想起了家，想起了大人孩子，我若是死了，他们怎么办？越想心里越急躁，屁股跟针扎似的，怎么也坐不住。

车开得很快，不会儿就到了丰台，稍微一停，车就又开了，我心里还是琢磨逃跑的事儿。车到了廊坊，警察跟大伙说：“谁也不许动！不许买东西！”他们在车上来回溜达着，严密地监视着我们。

我从前头往后走，警察拦住我说：“上哪儿去？”我急忙

說：“上廁所。”他沒說什麼，我就進廁所了。可是廁所不讓關門兒，對着廁所坐着幾個警察和鬼子，如果在廁所里幹什麼，他們都會看得清清楚楚，我解開了褲子，蹲下假裝拉屎。

車又開了，心跳得都要蹦了出來。我想：死活全在這一下子了，死也死在中國，決不死到日本去，就這樣，我下定了決心：跳車。

我知道車站上的規矩，車才一開動時，站上的路警、鬼子……全都得立正站着，目送火車跑出最遠的信號，才能回去。我等待着這唯一的時刻到來。

這一時刻終於到來了，我站起來系好褲子，輕輕地迅速地關好廁所的門兒，輕輕地又把車窗打開，先把腿伸了出去，兩手抓緊車窗，兩眼一閉，猛地就跳了下去，噯哩咕嚕地滾到路旁的溝里。車跑遠了，遠處傳來車上的槍聲。這時，我也不知道摔壞那兒了，只是俯在地上。爬呀！爬呀！爬到離鐵路遠了，才站起來了。走了一里多地，覺着頭上有点涼，我用手一摸，才知道腦袋摔壞了。鞋也只剩下一隻了，肚子也餓了，我晃悠着走進一個村里。到了一個老乡家裏，出來了一位白髮老太太，老太太一見我這樣子就說：“快！快！快屋裏來。”說着老太太給我的傷口上了一把白面，又給我包上，還給我做了飯吃。溫暖地住了一夜，第二天我就輾轉走到北京城裏的朋友家裏，在他家避難，不敢回家。直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才又回到了長辛店。

## 我們怎样給日本鬼干活？

王俊山說 刘寿昌記

日本統治那時候，工人干活有了个規律：鬼子打工人打得越厉害，工人們也泡得越厉害。

那时我使的是盘小旋床，每天我干出来的活可不少，就是沒一件正經活，干的全是私活，即便是作了点活，也不交，把它收起来，准备下班让日本人看。

有一天，快到下午七点了，我从早晨装上的圓肖还没有旋完。原来我是把活装上以后，先荒削一遍，然后把車刀撤下来，把車打得飞快，就是不吃刀。日本人从远处一看，我的床子轉呢，他也不来細看。这时我就坐在一边，也不睡觉，合着眼养神。呆了一会，听见日本人的大皮鞋嘎吱嘎吱地走过来了，这时我飞快地一扭身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已經磨好的刀，立刻关上車，两手几下子把刀装好又開車，把車打得比剛才更快了，日本鬼子在旁边看得出了神。这时我就象真事一样地越干越欢，日本鬼子張开滿嘴的金牙，把大拇指一伸說：“大大好！頂好！頂好的！”看了一会儿，鬼子怪得意地大搖大摆地走了。我看他走远了，瞧着他的背影忍不住发笑，心里說：“冤死你个王八蛋！”

上夜班，那就更好办了，可以連一遍也不用旋。白天旋下来的鉄沫不扫走，把它存在一边。到夜班时，把鉄沫往床

子上一倒，日本鬼子最信鉄沫，一看你床子上有鉄沫就行。

那时我旁边有个小插床，那位工人他更有办法对付敌人，他把一个要刨的軸箱装好以后，就把用惯了的小桶拿出来。那桶里放着一桶鉄沫。然后把小筒放进軸箱里，把刀对好，开開車，让刀一上一下地老往小桶里插，車刀一上一下的，就从桶里带出鉄沫来了，这样从远处一看，好象干得挺欢，其实人早在后边睡着了。赶到天快亮了，把这套装备收起来，人睡够了，也不困了，就随便刨两下。到下班时候，他把几天作出来的活全摆在床子前面。日本鬼子过来一看，床子上鉄沫不少，作的活也不少，就又伸伸大拇指，另一只手拍着他的肩膀說：“頂好頂好的，你的，米西米西的去。”我們低着头微微地一笑，对接班的工人使了个眼神，意思是說，“把活好好地收起来吧！准备下回再对付这些鬼子。”

# 我的学徒生活

刘 琢

## 一、进 厂

日本鬼子統治时期，“完成大东亚战争”“建立共荣圈”还在有气无力地叫着，恐怖弥漫着长辛店，饥寒席卷着每一个人。我家同左右邻居一样，奔上了早飯，就同时得操心晚間的柴米。常常現做飯現去除粮。因为实在揭不开鍋了，逼得我进了大厂当上了小苦力。这时我才念了两年小学，走进工厂北門，如同进了鬼門关。我幼小的心上，也知道鬼子这碗飯难吃。再加上失学的痛苦，心想十多岁到这里来，一辈子全完了。咬紧牙关也拦不住泪水往下淌。头一天进厂，日本大胡子指着我們說了一句：“你們通通的养成工。”点完名，就排队进了翻砂場大房子。工人們一見我們进来，就喊：“来看呀！連吃奶的孩子也来上工啦！”說得我真心酸难过。

## 二、学 徒

我們学徒的地方，叫“机工养成系”。里面还有两班学习生，一年級帽子上一个白道，二年級二个。我們这群养成工光着脑袋。早晨上班都得光膀子下操，稍息、立正，口令全是日本話，大胡子持棒监督，好像一天不打中国人手就发痒

似的。有一次，大胡子无缘无故的，两眼一瞪，叫：“前五排跑步，顶好没有！”接着就叭！叭！叭！每人当头一棒，不偏不倚向人人脑袋上打来。个个头上肿了个大包。三天两头要跑上坡，不管你吃黄豆而拉稀，也不管你有病发烧，谁跑回来晚了，大胡子在门口拦住得跑个二回。鬼子还规定二年级可以打一年级，一年级可以打养成工。不使劲打还不行。学习生也学不到技术，养成工除了学两句日本话以外，连榔头把也没摸过。早操完了，不是去库房运料，利材场抬烂铁，就是去客车运木头。谁愿意给他们干啊！我们就从早泡到黑，见空就砸他们的东西。

每人中午发一个化学面的馒头、一个饼子，爱饱不饱，不够拉倒。应名每人一碗菜，其实是白水熬白菜汤。挣鬼子这点化学面、喂猪的豆饼，不如说是用挨揍换来的。

比挨打受气更厉害的是，他们全不管这些小孩子的生命安全。那时，什么工作服、手套、眼镜，根本没听说过。也没有什么安全教育，只叫小孩子干活。高存德儿子就是被小火车轧死的。我也亲身经过一件悬事。就在现在的南门，那里拉着三千三百伏的电网，鬼子拉开闸，叫我们学徒工去电网里拔草。拔着拔着不知谁嚷嚷了一句说要开支补钱，我就回家取图章去了。回来看到电网里拔草的伙伴们全回去了，我要进厂，怎么办呢？当时我知道前几天这里电死一个工人，可我一点不懂三千三百伏的电力有多大。我就一手攥着木桩，一手去试摸电线，一摸没电，就窜过来了。事后别人说：“幸亏还没合闸呢，不然离一尺远也能把你吸上，更甭说用手去摸，就非电焦了不可！”我这条命真是捡来的啊！

那时我觉着糊涂，想着为啥他们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孩子呢？今天才明白，鬼子是想把我们养成他们驯服的亡国奴！

### 三、希望、失望

一九四五年，八月間一个早晨，上工的人群正圍着豆腐摊，有的蹲在桥头，白嘴啃着高粱面的黑窝头。忽然，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开了。穷哥們一听，是喜从天降，人人都笑了，都說：“不当亡国奴了！”“这回准安居乐业了。”大家互相道賀。这一天工人們都是抬头进的厂。日本鬼子都蔫了，罪惡大的还遭到中国人的追打。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員們来了。“欢迎中国军队”的場面到現在我还記得清清楚楚。特别是我們这群小“亡国奴”生平头一次看到中国军队走出車站，我們哪懂得国民党这八年干的什么事，跟着就喊：“中华民国万岁”。哪想到兔子的尾巴——沒多长，两个月都沒过去，希望就風吹云散了。国民党的官僚政客拷上了成串的姨太太来了，军队强住民宅，飞来的接收大員个个扛着耙子搜錢，物价飞快地上漲了。我們这群可怜的孩子一心指望着国民党能給我們书讀，盼得眼睛都直了，足有半年多，才把我們由养成工改成童工。分成三班。应名是学习，其实沒正式上过一天課。根本沒正經人管我們，天天扫院子，完事就神聊、罵街、胡混，高兴哼哼两句卖杂货摊上收音机里放的黄色歌曲。再聊有个大摩登飞机头和国民党营长勾搭上了……大点的孩子躲到房边上玩着一翻两瞪眼的牛牌。这样下去，怎么行啊！我們几个要强的童工就找伪工会請願。第二天工会主任李金堂来給我們講話了，他說：“大家要明白这个意思，工厂早把你們‘刷’了，还是工会給保下了。你們就老老实实的吧！”童工們一听，張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都說：“是这样啊？咱們別沒事找事啦，干脆眯着吧！”这群十几岁的孩子，只得就这样听天由命，荒廢着我們的黄金时代。

可是，誰知就这样也还是不行，一天，剛吃完午飯，搖鈴集合了。大家心想：国民党来一年了，許有点什么好消息了吧？“好消息”可真来了，管事的董先生把我們一班的都叫到屋里，說：“工厂不要你們了，你們回家吧！”一听这話，小同學們都哭成一团。我是不爱落泪的，看大伙都哭了，我也哭了起来。

董先生說：“給你們三个月錢，三七二万一，你們回家作个小买卖吧！”一个童工說：“二万一千元，剛够一葫芦醋錢。”另一个喊：“到明天連一葫芦醋也买不了。”

到底是小孩，二、三班童工他們覺得僥幸沒被刷，有的乐得直翻跟头。为什么二、三班沒刷呀？也許工会李金堂真給保下来了？

不过一点钟，真相大白，原来送公文的老头少拿了二張名单，回去走到半路发觉了，又給补送来了。于是苦戏又在二、三两班重演了一次。

在去总公事房領“开除錢”的路上，大家可都不哭了。有人說：“我給他們狗仔打坏三块玻璃，再在院子里給他媽拉屎。”也有的說：“这是蔣委員長給咱的大恩！处处不留爷，爷去当八路！”大家喊个不停。

从总公事房窗口一份一份地往外递錢。穷孩子們等得煩了，七嘴八舌地直罵。管錢的職員光听着，誰也不言語。

#### 四、失业的痛苦

失业了，眼看着窝头眼朝天了。各处都是一批批刷人，想再找个职业，比登天还难。

流浪的人群挤滿了街头，伙伴們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被抓走当兵。我搭了几个伙伴，去丰台，走大井，买些茄子、

西红柿，挑回长辛店来卖，去过良乡买桃，窦店买瓜，琉璃河买莲蓬。偷乘火车，查票的见我那样子，也没法让我补票了，就打两个耳光。在西道口，曾赶上过国民党匪军实弹演习，成串的枪子落在我的眼前，把地打起一股股黄烟。有一次从良乡回来曾和地雷坐在一起。我就作这卖命的小生意一直到解放。解放后，我进技工学校作了学生，学了技术和文化。这个技校现在已经办了十年，在我们后几班的同学可再也没有我们这样的经历了。

## 額 外 員 工

張 貴 亭 等

一九四六年秋天，工厂里的“大員”們对工人剝削得更凶了，常常晚給工人們开支，把工人的工資存进銀行吃利息（当然还有伪工会干事們一份）。有一次，过了十来天也不給开支，工人們都盼着打开支钟。这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忽然开支钟当地响了，我們急忙跑到公事房門口，到那儿一看，不象开支的样子。等了半天，伪工会主任李金堂出来了，他首先說明这次召集大家来不是开支，因为款还没下来，目前国家困难，鐵路收入少，不好办……。最后他說：“工会知道伙友們生活都有困难，就急急給大家想了个办法：眼下台灣特別需要鉄路上的工人，那里生活好，整天吃大米，工資也高……。誰要願意去，就报一下名，工会給介紹去，路費都管……”当时（一九四六年），台灣从日本鬼子手里收復不久，大家也搞不清台灣在哪里，有的說台灣太远不一定怎样，有的就說不管山南海北，有飯吃就行，于是就有很多人报了名。

报完名以后，很多人心里还“撲噔”了好几天，到底台灣是个甚么样呢？生活真能好嗎？……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地过去了，去台灣的信儿却沒有了，这些人又着急起来。

星期六下午，那个老不按时打的开支钟儿又“当当”地响

了。好，这回一定是开支，再不就是去台湾的信儿来了。我们这么想着，又都到公事房门口集合了。人来得都挺快，可是公事房的大门却关得严丝合缝。等了好大一会儿，大门“吱扭”一响，李金堂才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了。看他神气，好象是要给工人解决生死问题，你看他慢腾腾地往高台上一站，脸朝着天问：“来齐了吗？”我们没人答话，他喘了口粗气，接着说：“今天召集大家来没别的，就是跟你们交代一下‘额外员工’问题！……”我们一听，这又是个新名堂，当时就给楞住了。有的没听清的，下边就说：“饿坏员工？哼！不开支不饿坏怎么着！饿坏了还交代个屁！”会场乱了一阵，李金堂又接着说：“由于铁路营业不佳，咱厂修车减少，赚不了钱来，给大家开支有困难。为了照顾大家都有活作，都能开支，咱厂得减去一些额外的员工，不过这是暂时的，等国家铁路事业发展了，这次减下去的人员再回到厂里来，要是国家情况不好转……还得继续减人……”我们这才明白了，原来是工厂要裁员，可真急了，在这儿干了十几年、二十年还是吃不饱饿不死，再从这儿被裁了，要想找个新地方能吃上饭，那更比登天还难了。这么一来，下边更乱开了。有的生气地说：“不给按时开支，工会不管，还要出头裁人，这是什么工会呀？真他妈混蛋！”会场这么一乱，李金堂也没法再拉长了讲，他大声喊道：“大家都不要着急！这只是暂时的不得已的办法！再说，咱们减人是大公无私的，打个比方，就跟老天下雨一样，雨点落到谁身上算谁的！咱们的办法是，明天清早在北门贴榜，榜上有谁的名儿，谁就暂时找别的事儿作作，榜上没名的，就先留在工厂上班，明天也得到工会领件好东西，出入证！没有出入证的下星期就不能进厂了。”这时下边更乱成一团了，李金堂看会没法再开下去了，就喊了声

“散会”，溜进办公室去了。

这时下班的汽笛“呜——”的一声，跟哭似地响了。工人们一看李金堂溜进公事房去了，只好提心吊胆地往家走。等待着明天的命运！这天，有的工人整整一夜全没合上眼，好不容易盼到第二天天亮了，连稀粥也没喝一口，跟线拉着似地跑向工厂北门。到大门一看，啊！足占半堵墙的大“黑榜”早就贴出来了。上边密密麻麻地写满小字，不下五百多个人名儿。没问题，这五百多个人就算吹了，再想到工厂上班，那等于是“白日作好梦”了。

看“榜”的人一群一群地陆续不断，人们的脸儿都好像蒙上了一层灰纸，很少有人说话，有的走到“榜”下，听别人说有他的名字，扭头就走了，连头也不回。有的人左看右看，看的眼里都模糊了，明明是自己的名字在上边写着，还是左端详右端详地不敢相信是自己的名字，家里挨饿的老人、孩子，又浮在他们的前面了，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大家看完了榜，定了定神，再细看了一个过儿，不约而同，立刻都发现了一件特别的事：凡是上次报名去台湾的人，这次一个不缺，都榜上有名。这可真怪了。这些人立刻感觉到了，苗头不对，有几个人忙跑到工会去问：“为什么我们报名上台湾的都裁下去了？”他们回答得更新鲜，一挺脖子向着满院子工人理直气壮地说：“工厂要留，当然是留下那安心肯干的，你们既报名就是没心在长辛店干了！不裁下你们去，还裁谁？”

当下把这些人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原来所谓去台湾还是个圈套，是专为骗你报名，然后好裁你！不用说，后来台湾也根本没有去成。这些上了当报了名的人，就此失了业，流落在街头了。

## 逃 兵

閻國忠 和 林等

在厂里鬧“額外員工”那一天，保長們又抓起兵來了。不用說，這和偽鎮長兼的工會主任李金堂又有關係。我們一伙人急忙又往野地里跑去。這些天，我們天天一下班，就往這兒跑。

在庄稼地里這罪不好受，天兒挺熱，透風的地方危險不敢去，只好在密密的庄稼地里，白天跟蒸籠似的，蒸得你喘不過氣兒，夜里蚊子更多，地皮又濕又潮，真他媽的活受罪！這天，我們一直等到天黑，又渴又餓，嗓子跟火燒的一樣，肚子里餓得咕嚕嚕直響，可就是不敢回家，只好忍着。在天大黑了的時候，西北上忽然冒出几塊紫黑沉沉的飛云，一会儿就壓到我們頭上來了，庄稼叶子嘩嘩一响，身上立刻有點發涼，心想糟了，要下大雨！可不是，一道金蛇在云彩里一钻，“嘩啦啦！”一聲雷响，地皮上“吧嗒吧嗒”地掉起大水点子來，雨點越來越密，一会更下起瓢潑的大雨，我們立刻淋得像落水雞，地里的水嘩嘩地流起來，本來我們是又累又困又渴又餓的，這一淋倒好，問題全解決了，冷可就受不住了，身上一个勁地“篩糠”。雨停了，衣服粘在身上，小風一吹，冰涼冰涼的，這時困勁又上來了，真想躺下睡會兒，可是地上連泥帶水，站腳的地方都沒有。最后實在熬不住

了，有人提議說：“下了這麼大雨，路上滿是泥水，保長們准不出來了，咱們回家吧！”“對！豁出去啦！回去。”於是閻國忠我們幾個人仗着胆子，偷偷地摸到了自己家，街里沒有動靜，輕輕地把門敲開了。這回可想平平安安地在家過一夜了。心想這樣歇個空在家睡一覺，該有多舒服呀。進屋急忙脫了濕衣服，擰了擰掛起來，饑餓的肚子正作響呢，老婆弄點稀粥和窩頭，大吃大嚼起來。正吃得香的時候，不料“當當當！”門被打得又急又响。甭說，查戶口抓兵的來了。這真是個意外的襲擊。怎麼辦呢？再跑是來不及了，只好躲藏起來。有的上了房，有的蹲在旮旯里，有的來不及找個安全的地方，就鑽到床底下。等保長領着偽軍走進門來，老婆迎上前說一聲“沒在家”，偽軍們就亂翻起來，保長在屋子裡轉來轉去翻白眼兒，翻了半天，沒翻出來，保長只好搖搖頭，領着偽軍“巴兒巴兒”地踩着泥水走了。這一關，大部分人都算躲過了，可是閻國忠一時大意，在剛進家門的時候，被偽軍看見了。沒容他躲藏，就被偽軍們綁起來送到警務段去了。

老闆是這次“額外”的員工，這回又被抓了去，真是倒霉。按說他是外地人，在長辛店沒戶口，不應該捉他當兵去。可是偽軍們可不管這些，抓着人就走。當時保長跟老闆說是“抓鬮兒”抓着他了，老闆說我根本沒去抓什麼“鬮兒”呀。保長却說是別人早給抓好了。

老闆從警務段又轉到長辛店兵營里，到兵營一看，抓來的新兵足有百八十號人，有老有少。為什麼還有老头子呢？他一打聽才知道是兒子跑了，把爸爸抓來頂數的。偽軍們以為把這些老头子抓來不放，還不把兒子送來呀？可是這些老头都寧願自己受罪，也不把兒子弄來當兵。抓是被抓來了，可是被抓來難道就真的去給蔣介石當炮灰嗎？老闆一進兵營

門，就下了決心，還是得跑。

過了幾天，偽軍把這伙人送到南苑兵營里，一到南苑，就開始了軍事訓練，早晨起得很早，就去練走步伐，老闆他們誰也踩不對“一二一”的口號，一喊“立定”，也是亂七八糟的，一練就是幾天，可就是練不好。偽軍們想了個辦法：每人腳脖上拴上兩根一樣長的繩子，前後都連起來，教官喊一聲“一”，有人就在前面拉一下拴在左腳上的繩子，喊“二”就拉右腳上的繩子。這麼個練法，當然錯不了，可是把繩子一解，還是照樣亂七八糟，氣得教官沒辦法就打人。要是集結站隊時，你要是稍微靠向前點，上來就是一個大嘴巴子，要是站得靠後點，後邊就是一腳。老闆來的時候本來就打算跑，挨着這份打，心裡氣老不平，逃跑的心更切了。不過逃跑這事兒可不容易，整個兵營里崗哨無數，夜里還有值班巡邏的，門上出不去，牆上過不去，怎辦呢？要是一次跑不了，那可完蛋了。不說槍斃，也得受大罪，再想跑就沒門了。老闆挺發愁，他這一發愁，可就有人看出來了。有一天晚上，一個中年人偷偷地跟他說：“你是不想干這個吧？家里都有甚么人？生活怎麼樣？”“老家在保定，有父母、兄弟，長辛店有老婆和兩個孩子，都指着我賺錢吃飯，這回被工廠作為額外員工裁掉了，正沒轍呢，又被抓來了。嚕！……”老闆一提家里情況，又傷心起來了。那人挺同情，又說：“不要緊吶，你不会逃跑嗎？我們有幾個是雇來的，使了保長的錢，可是我們也是不想干這個。不過我們現在不能跑，我們給人家保的三個月，三個月以內跑了，他們不干。你要跑的話得快跑，過了三個月我們這樣的都得跑，跑的人一多了，你就不好辦了。”那人停了停又滿有把握地說：“營里多緊，對我們吃熟了這行的來說，沒關係。我們怎么都能跑得了。”老

閻一聽這個，跑的決心就下定了。可是到底怎麼個跑法，却是個難辦的事兒。

好幾天過去了，老閻始終沒找着逃跑的機會，他心裡非常焦急，正在發愁的時候，忽然班長讓他跟出去買菜。老閻一想機會來了，趁出去買菜，到北京市里以後，找個人多的地方，鑽進小胡同，他們就追不上了。他把這種想法當時跟那個給他出主意的新兵一說，那人立刻說：“這可不行！到市里边哪兒都有警察，他們一通知，你就跑不了。再說你家里也沒準備，逃跑以後，家也受不了哇！”那個人想了想，又說：“這倒是個造條件的好機會，出去以後你可以找個理由請假回家一次，好好跟班長說說，回頭按時回來，先讓家里回老家去，你請一回假，按時返回，取得班長的信任，下次就好請假了。等下次，你就可以直接奔車站，上了火車走了，他也沒地兒找你去了。”老閻一聽，真是個好辦法，要是不讓那個人這一說，非得把事辦砸了不可。老閻按那人說的辦法辦了，這一回一切都挺順利，回家安排老婆孩子回老家，又回到了兵營。兵營里一天比一天緊了，新兵跟着外出的機會很少，十幾天很快地過去了。

正在一個星期天的上午，老兵、班長們都放假了，伙房里缺人手，老閻就自動找到伙房“幫忙”，恰好伙食班長又要出去買菜，老閻就跟這班長說，家里有急事得回去一趟，能不能跟他出去，到時候一定回來。伙食班長看老閻這人老實得很，上次回家就回來了，不至於出什麼岔子，同時也正好外出沒人呢，就答應了他的要求。老閻這回出來，可就不奔家了，直接到車站買了張火車票，就上保定了。到了保定，才算出了虎口。他在保定混了一陣，一直到解放，才回到長辛店工廠復了工。

## 选王八

牛恩福等

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国民党要选举“国大代表”。长辛店伪工会的張順、韓老疙瘩这班人早就忙开了。在选举的前夕，工厂里就出现了很多拿纸本儿、拿纸条的人，他们见人就问：“算份吧？”你要说算，就给你记上了。有一个人去问客车场的馬振山，馬振山说：“算一份。”等过了两天，那人去问馬振山要相片。馬振山不知事情来由，就急忙冲那人问道：“要相片干吗？”那人答道：“你不是算了一份吗？那就算入国民党啦！入国民党就得交相片儿。”馬振山一听，急忙摆手说道：“不不，我认为是谁家办红白喜事算份子呢！要是入国民党，我可不算那份儿。”国民党一边这样乱拉“党员”，一边还召集会议宣传，说什么蒋光秃子要召开国民大会，这就要实行宪政了。选的代表替人民说话，弄好了，咱们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可能每人至少给两袋白面，涨工钱也有希望了……。他们不但到处宣讲，还贴标语，这是国民党接收以来的第一次了不起的活动，把个总办公室（现在生产科）搞得很是华丽。他们尽管这么卖出命去折腾，我们工人当时心里可都有数，什么国大国小的代表不代表，这几年我们可受够了。替我们说话，长工资，给两袋白面……，没门儿！

这个选举大会经过几天的筹备，正式开始了，怎么个选

法呢？各場的代表把工人們集合到一起，又唱了段老調子，說什麼實行民主，每個人都有選舉權，要選能替我們工人說話的，要去中央，資格很高，咱們選誰呢？當然工人里边沒有，咱們必須選平漢路北段特別黨部書記長張瑞冀，他抗戰有功……。我們要好好參加選舉，不參加也得參加！誰要不參加選舉會……。哼，把工人們吓唬了一通，就讓我們排着隊到總辦公室去選舉。

咳！張瑞冀！我們年輕的是不大知道他。咱廠的老師傅們可都認得這張瑞冀。原來這位“書記長”大人也並不是外人，想當年“二七”時候，他本是咱廠的工人，也是當年革命工會里的一名幹事。“二七”一流血，他出賣了朋友，破壞了工會，投靠了敵人，當了一名工賊。如今他已經官高爵顯，就是張順他們這班後起工賊的老祖宗了。要我們選的就是他！

我們進會場一看，嗨！這才熱鬧呢。張順、韓老疙疸這伙人，腰里都別着盒子槍，惡凶凶地在里边站着，吆喝着什麼。會場上除去滿牆胡說八道的黃綠標語以外，當中有幾張桌子，桌子上擺着幾個大字：“張瑞冀”，頭上懸着的大牌子也是“張瑞冀”……。還沒有等我們看完，就發給了每人一張白紙，讓我們到里边桌子按照“樣子”寫上張瑞冀三個字，不會寫的有人給代筆。牛恩福拿到白紙以後，走到桌邊剛想寫，有人就拉了他一下衣角，他抬頭一看，前邊王彬因為寫錯了張瑞冀的冀字，就挨了韓老疙疸幾個大耳光子，這下把人們給氣壞了！這時張順又狠狠地指着“張瑞冀”的牌子說：“看這兒！不許不選，不許選別人！”我們心說，真還不如刻個“張瑞冀”的大戳子擺在這兒，誰來了誰按一下省事“安全”呢！這時，我們幾個人互相擠了擠眼，拿起筆來，找個不顯眼的地方就寫起來了，三筆兩筆就完活，把這張紙一揉搓，就扔進票

箱，急忙跑出屋子。溜出来以后，这个问：“你怎样写的？”  
“白紙！”“你呢？”“老白！”“我是老空！”“啊啊！都是交的白卷  
呀！”牛恩福忽然兴冲冲地说：“我可是选的張瑞冀！”“你怎么  
选他呢？”“我是給他画的像！”“你知道張瑞冀是个啥德行？”  
“嘻！甭管我没见过他，要按我画的像来说，百分之百的象！”  
“你到底画了个什么？”“哈哈！我画了个‘小王八’！”“哈哈  
哈哈！”

## 电蜡惹祸

王福堂

那是在我祖母去世的时候，出殯那天晚上放焰口，按祖傳下的老皇历來說，得点对蜡，可我家沒有，就从翟湘云家借来了一对电蜡，点了一晚上。

沒过几天，住在曹家大院里的宛平县政府秘书文新的母亲死了。他家和警务段大特务王玉杰关系密切，知道我家点过电蜡，就向我家来借。我們使完還沒顾得还，就被他硬借去了。他們使了好久，也不还，我們去要时，才知道給弄坏了一个灯泡子。这时我們可慌了，对他說：“这玩意儿坏了我們不知哪儿卖，这是借别人的，你是不是給买一对？我們付錢。”誰知人家連理都沒理这个碴。反而把这事儿告訴了王玉杰。

一天，我父亲、我叔，一个姓刘的和我，四人正在家拾掇門儿。忽然有一个留分头的小特务闖了进来，这人穿长袍馬褂，一进門儿就對我們气势汹汹地問道：“你叫什么？”“我叫刘某某。”他一听不对，扭过头来又向我問道：“你叫什么？”“王福堂。”“你把那四十斤銅放到哪儿去了？”这真是晴天大霹靂！“什么四十斤銅？我不知道这么回事儿呀！”“你干的事你还装蒜！”他上去就給了我一个大嘴巴。“跟我走！”我想：沒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門，走就走吧。我跟他剛走出門口，就

看見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手挎着竹篮，迎面走来。这个留分头的小子一見，立刻灵机一动，踉踉跄跄上前拦住老头就問：“你是哪儿来的？”“西峰寺。”“啊——西峰寺！好哇，你来这取贼赃，是唄？”沒容老头开口，就連他一夾铐住了，“一同跟我走！到他家去翻！”

这事眼看要鬧大了，可巧在我們街坊北屋，住着一个姓張的，名叫張德祿，是六一八厂的一个特务，跟王玉杰他們都有关系。我母亲急得沒法，只得恳求他看同院份上給說說情。这小子今天也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想必也是为显弄自己的面子，他当时給那留分头的小子說了几句，不想他們居然把我放了。

这个时候正赶上过年，我母亲对我說：張德祿帮咱办了事，咱买点东西，你去給他送点儿礼吧。那种世道，我无可奈何，只得湊了点錢，买了两条魚。母亲非让我自己送去不可，我便硬着头皮提着两条魚，跨进他家屋門，就看見屋子里坐着两个贼眉鼠眼的人，都是四、五十岁，沒顾得仔細看，把魚放在他桌上就出来了。我一出門儿，越琢磨这两人，越是不对头，心想：“不是要出什么事吧？”

我們車間有个老师傅張景才，脾气頂好。一天夜里，他正干着活，忽听背后有人問他：“王福堂呢？”張师傅一抬头，見是王玉杰他們这伙，心里知道不是好事儿，順口忙答道：“不在这儿，走了吧！”王玉杰一听，連忙带着一伙人，向前边揚长而去。

王玉杰前脚一走，張师傅赶忙跑去找他的儿子張瑞。叫張瑞赶快来通知我。

那天夜里，我刚下夜班，正蹲着洗手，忽然張瑞跑来，气喘喘地对我說：“福堂，快跑！王玉杰带着人抓你哪！”我一

听，就吓呆了，張瑞又催我說：“快跑！出北門行不行？”他一提醒，我提起飯盒子，忙往鍛工場那个方向跑去。

那时候，咱們厂一共有两个門口，一个是东門，一个是北門。东門专是工人上下班走的門，北門是当头儿的和先生走的門。在王玉杰追我的时候，东門四处早已把好了，要想逃脫，可不大容易了。

他們正在乱找我，忽然听到四处电鈴乱响！这下工人们可都慌了。好些人急得跺脚：“千万不要被电网电死了啊！”

王玉杰听到电鈴响声，得意洋洋地说：“不用找啦，黑天半夜也找不到，反正王福堂这小子非电死不可啦！”这一伙听到王玉杰的命令，才大搖大摆地走了。

我一跑就跑到鍛工場，正好碰见了赵师傅，当时他是領一道半牌的，可以出北門，我求他說：“請你帮个忙，王玉杰到处逮我，我想从北門出去。”“行！你跟我后边走，可千万不要害怕变色。”剛走到門口时，看見日本一个小报义（日本的仆役），他指着我說：“你怎么也从这儿走哇？”赵师傅对他一摆手，这个小子挺机灵，再就不說什么了。赵头催我：“快！”这时正赶上守卫的那个中国人一回头，正好象和那个日本人低头說話似的。趁这当儿，我一个箭步，就溜了出去。

我逃出門口后，又楞住了。往哪儿躲藏去呢？这时我忽然想起一块工作过的一个工人，叫田世杰，他就住在北边不远，我想只好先去他那儿。当我到了田世杰家里以后，世杰正沒有回来，我把这情况給他老婆一說，他老婆挺恳切地说：“行！你們穷弟兄們应该帮助，我給你做飯去！……”又过了一会儿，世杰回来了，又把这情况給他一說，世杰說：“一定帮助！你先吃飯，吃完飯，咱再說。”

我們放下了飯碗，就商量开了。世杰說：“这样吧，我在

前边走，你在后边跟着，离开十多步远，要是碰上有事儿，我就咳嗽，你就跑，这样出不了事儿。”我同意了。世杰又问：“你计划上那儿去？”“我想先到我父亲那儿再说。”于是世杰照这样办法领着我到了大寺口酱醋胡同，他给我叫开了我父亲的门才回去了。

我把这事儿给父亲一说，我父亲可吓坏了，忙给我找了个背人的地方，然后对我说：“你先住一夜再说。听着，我要一嘘嘘，你就赶紧上房！”

一夜无事，晌午饭后，我父亲对我说：“这样下去，恐怕危险，你上你岳父那儿呆着去吧。他那儿是村外，你吃了饭可以多在野地里呆着。千千万万要加小心。”

从那以后，白天我就在山坡上呆着，快到吃饭时，就往门口望，望见我岳母在门口，就知道这时无事，可以去吃饭。吃完就又上了山坡，这样下去，呆了几个月。

这一天，忽然家里捎来了个信儿说，托申头给日本主任说过：“王福堂没有偷过什么，让他上班吧。”日本主任说：“可以。”在厂外也托了人了。我想：一直这样呆在那儿也不象话，就硬着头皮上班吧。我就回到长辛店来了。这一天，我进了厂，先到工具房去领工具。正在这时，张景才也在这里领工具。他看见我，就惊慌地说：“你怎么这样糊涂呀！就是咱怎么困难，也不能来虎口找食儿呀！”他又小声告诉我：“大年三十儿，我就听王玉杰这小子说过，‘王福堂耳朵可真灵啊，我在长辛店逮那个不是一逮就准呀，可就是没逮住他。坏他妈的一个电蜡子也要赔，……’看来他还饶不了你，你还是躲吧！”

我一听张师傅的话，心里马上打了个寒颤，只得急忙又去找申头，开了张出门条，翻身就出厂来了。到家吃了点东

西，就給家里說：“我非得走！不能在家呆，有危險！”收拾了一下，就奔北京我舅舅那儿去了。

那天我剛出家門，就有警務段持務找我去啦。我家里人說：“上班啦。”他們問：“他几天沒上班啦？”又問：“他上哪兒上班啦？”家里說是上廠里。后来他們又拿出像片來問：“哪個是他呀？”……这样一連去我家直問了兩三次。

我到北京以后，又在北京檢車段找了個工作，并且改名王富堂。那时家有妻儿老小，誰不想着家呀！所以我总是夜里披星戴月地到家来看看。直到“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以后，才又托申头介紹回来上了班。

这就是我为一根电蜡蕊下的一場大禍。

## 落 車

張 貴 亨

提起国民党統治时期，修車也不算少，一个月有五、六台。換个連杆套，补个砂箱大窟窿也算一台。落一台車可不容易了，当时沒有六十吨大車，都用人力搖鎚。

我們大軸班的工头叫刘印，五十来岁的人，还算精神，每落一台車，他就得遍地去我大軸班的工人，因为大伙誰也不肯給反动派好好干活，早就各找各的稳当地方呆着去了。聊天、打牌、下棋，干什么的都有。刘老头还算有办法，他集中力量找我們組长子文。于文当时有四十来岁，虽然肺病把他折磨得够呛，但是推起小牌九来还滿有精神。

一天有一台么〇五要落車，刘头全厂到处找人，走到那个沒修好的厂房时，看見圍着一堆人，原来是一个工人由吊車掉下来摔在砂堆上，手摔伤了，嘴里还在埋怨于文不顧人命，光注意推牌九搶地方，把他摔下来。大家把这工人背走，刘头才想起自己正找于文，于是向大車上大喊“于文，于文”，原来于文早下来站到他背后了，說：“刘师傅有事嗎？”刘头一听是他，忙央求說：“大叔，行个好吧，把人快找回来落么〇五。”于文无可奈何地只好各处去找人。

这时，伙友們有的在房頂上捉鴿子，有的在水箱里下棋，有的躺在鍋炉里燃燒室上睡覺，亏得于文知道底細，不然真

不好找。人回来后，大部分人摇筛，王四和小張吊輪子，輪子吊过来往鐵道上放。这时小張想起剛才沒有下完的一盘棋，他嘴里說开了：“王四，剛才那盘棋不能和，单車划炮能贏。”王四忙說：“哪里，哪里！是和棋，我車总不离当头，你没办法。”小張不服气地說：“你不懂，棋式有一招叫炮坐將軍底，你真是不懂。”不懂两字剛出口，只听輪子噗咚一声掉到地沟里去了。大家圍过来一看，不偏不正鐵道正鋪在曲拐肖上，碰坏了一大块，工头只得去找車間主任“坏小”想办法。

这“坏小”姓王，当面人叫他王主任，背后都管他叫“坏小”，整天价做坏事。坏小一来，大家閃开了道，他把小母狗眼一翻，瞧了瞧曲拐肖，又瞧了瞧刘头，用手一指，說了声：“你負責。”得，他的事儿就算办完了，扭头就走了。

大家都替刘头捏一把汗，最后还是管車輪的薛五提出重新給旋一个。大家一看，反正車是落不了啦，就此一哄而散。

## 忘不了的仇恨

王全說 黃磊記

一九四八年的阴历三月初九，是礼拜六。这天正赶我上白班，临下班的时候，工头告诉我，第二天得上西山坡修炮楼去。我暗里想：“修就修吧，修起乌龟壳也保不住你们的命，看你国民党能横到什么时候！”回家吃完高粱窝头，抽了几锅烟。我那一岁多的小闺女刚断奶，家里大人吃高粱，咬着牙给她买点小米，熬些小米粥喂她，孩子怎么吃得下呀，扒在她娘怀里乱哭，小手脚乱踢蹬，她娘要有点奶水就好了，可这个年月，打哪儿来的奶水呢？大人孩子直掉泪。我蹲在炕头一股劲地闷抽烟，心里鼓捣着后天的粮该怎么办？明天跑买卖是不成了……

孩子们都上炕睡了，我还低着个脑袋想心事，直到孩子他娘叫了我，才想起应该睡了。躺在炕上，说什么也睡不着，想呀想的，刚有点迷迷糊糊的，只听见村里的狗汪汪乱叫起来，一会有人打我的家门，把门打得山响。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时，孩子他娘也惊醒了，我叫她去开门。门一开，一伙穿军装的人冲了进来，借灯光一瞧，都是伪青年军二〇八师的，为头的戴着大盖帽的大概是个官儿，手里拿着手枪，后面跟着三个拿大枪的兵，那官儿旁边站着个穿便衣的人，个儿挺小。官儿一进门，就恶声恶气地问：

“誰叫王全？”

我正坐在炕上發楞呢，見他問，就說：

“我就是。”

“他媽的，還不給我下來！”

我問他：“這為什麼？”

“你個小子！通了八路還要裝蛋！來！把他綁起來！搜！”那家伙的臉色真難看，三角眼忽閃忽閃的，真象頭狼。他剛說完，後面兩個兵跑過來把我連拖帶拉地拖下了炕，五花大綁地綁了個結結實實。外頭又進來兩個兵，炕上炕下，鍋台碗盞翻個遍。孩子他娘吓得直哭，直求那官兒：

“長官，你行行好吧！孩子他爹沒有通過八路呀！……”

那小子一脚把她踢開了，口里直罵：“去你媽的！再麻煩，老子斃了你……”

我剛想開口，就給了我一巴掌，打得我眼前直冒金星。這時，我聽見我哥那屋里也在吆喝，我想准是也逮他們來了，過會把我拉到屋外頭，一看屋外，站滿了青年軍，把我家全給圍了，沖院子的大門前，還爬着挺機關槍。再等了一會，他們把我的大小子、二小子、侄子、侄媳婦，還有我哥哥，個個五花大綁地帶出來了。家里那份亂呀！全家大人孩子呼天喊地，哭得村上的人全起來聽，我那小閨女哭得嗓門也啞了。我想：“人要人証，物要物証，我上那兒去找八路……”

當天夜里，偽青年軍把我們押到二郎庄，爺兒六個給關在一間不通風的小屋里，五花大綁改成了腳鐐手銬。等第二天早晨，先把我帶出去過堂，那抓我的家伙要我寫口供。我說：

“我從來沒通過八路，也不知道八路是什麼人，叫我寫什麼？”

昨晚见到的那个穿便衣的就坐在他旁边，那军官问他：

“是不是他通的八路？”

那人站起来说：“正是他！”

我气急了，往前迈了一步，指着他就骂：

“我和你从来不认识，你怎么乱咬人！别他妈……”

抓我的小子没让我说完，上来就是几巴掌，打完又搜我腰，打我兜里找出一张纸条，指着纸条问我：

“你没通八路，这信是给谁的？”

我也不知道那纸条上写的是什麼，更不知道那纸条怎么会到我身上来的，我说：

“这太欺侮人了！”

那家伙一句话没说，叫来几个人，把我吊在梁上，身上脱得光光的，用皮鞭抽我，要我承认通八路。我咬着牙不吱声。他们轮流打我，直到他们累得出了汗，才歇下来。过一会，他们又把我二小子带到外屋去，还是那家伙问：

“你快说，你爹和你哥是不是八路？要说对了，就放你，还给你吃糖……”

我二小子那时才十二岁，什么也不知道，见那些家伙问他，他直摇头说不知道，他们就左右开弓地打了孩子几巴掌，孩子被打得倒在地上哇哇直哭。自己身上的肉，看着这情景，哪有不心疼的。我声嘶力竭地叫：

“你们别欺侮不懂事的孩子，要打就打我！”

于是，我又挨了顿皮鞭子……

过了一宵，把我们解到旅部。在那儿，一个长着酒糟鼻子的军官，坐在写字台后审问我。他用软的套我，我是早已下定决心，你怎么摆布我，我决不说出个“是”字。酒糟鼻子来了会软的，见我不要吃他那一套，显然是火了，可他还装着

笑了笑，一边点了枝烟，一边在桌上按了下。点着了烟卷，身子往后一靠，脑袋往上一靠，闭着双眼晴吐了口烟，拿烟卷的手冲我背后的墙角指了指說：

“去吧，你到那儿休息会也好。”

我还没扭轉身瞧一下，背后有人拍了下我的肩說：

“走吧，老兄！”

一个上身穿着黄咔叽衣裳的家伙，叼着个烟斗，正站在我身后。我这才看到墙角有扇小門。叼烟斗的把我帶到那屋里，那屋挺大，窗上挂着窗帘；屋里放着个大长板凳；墙角生了个炉子；靠窗还有把椅子；屋梁上，一根绳子直挂到地面。我想，准又要吊我了，可那家伙还挺客气地說：

“你坐在长凳上歇会吧，好好想一下。”

我想不透这是什么意思，要我坐就坐吧。过了一会，他問我：

“怎么样？想通了吧？”

我摇摇头。他又問了我一声，我又摇摇头。他就出去了，把我侄媳妇帶进来，叫她坐在椅子上。他自己站在椅子旁边，两只胳膊往胸前一抱，顛着个左腿問她：

“你說說，你家怎么通八路的！”

侄媳妇是个妇道人家，年岁又輕，見屋里这副摆设，早已吓坏了，她搖着头，哆嗦着說：

“我……我不……不知道呗！”

“不知道？不知道你就瞧我的！”那家伙怒气冲冲地說道，“开！”他右手举起往下一揮。我侄媳妇坐得好好的，突然叫了起来，想站起来又象給吸住似的，我知道这是过电，忘了自己脚上戴着脚鐐，站起就想把她拉下椅子，刚一迈步，就給絆倒了。屋外又进来两个人，一个把我侄媳妇拖了出去，另

外一个把我拖起来。我紅了眼，罵他們，叼烟斗的家伙打开了我的手铐脚镣，对我說：

“見了沒有？过电不是好玩的，你要說了，放你出去，不說，有你受的。”

我这时已豁出我这条命了，踩着两脚罵他們：

“你們就会欺侮咱老百姓！老子死了也要告你們的状！”

旁边那小子喝道：“躺下！”我就是不躺，他們把我硬按到长凳上，身上身下綁上两股绳，拿来一大壶凉水，直往我鼻里灌……

到第三天，旅部沒問出我什么来，一大清早，把我們押到門头沟去。又是五花大綁，到車站上火車，十几个兵拿着枪押着我們。我想：“想不到好生生的，会落到这个地步！早死晚死还不是一死。”到了車上，就往車外跳，要給車压死了也好，可給押我們的班长拉了回来，連他也几乎掉下去。这頓好打呀！枪托沒头沒腦地直往我身上落……到了門头沟，又是过堂审問、拷打……

人受着个冤枉罪，就盼着有人来救。可那个时候有誰能救我們呢？在門头沟獄里，听說山里有八路，心里老想：“只有八路来救咱們了！”

青年軍拷問了我們六天，見沒問出什么来，也沒有真凭实据，就想放了我們算了。但又为了好下台，就讓我們全村的人保了出来。爷儿六个掉着泪，人們扶着我們回到了家。一岁多的小閨女，還沒等我回家就死了。这七天，比七年还长呀！

这事已經过去十多年了。可这个仇，我这一生也忘不了！

## “二七”回忆

孙 慕 說 赵学勤 馬建群記

“起北京来到郑州，郑州过去到汉口，从南到北三千里，步步都是咱們工人修。每天工作像馬牛，工人的血汗不住地流；人养路来路不养人；这个京汉路呀成了饥寒的路。工人饥寒可就无出路，工人哪个能穿暖，誰能喝飽两頓粥！长辛店成了伤心店，伤心的事儿說不完。”这段歌儿，正是表达了过去我們工人們悲惨生活的情景。后来党領導我們举行“二七”大罢工，这次罢工虽然遭到挫折，但是党給我們播下了革命斗争的种子。

一九二一年，有一天，我在机械場正低头干活，一个和我一起干活的工友，悄悄地伏在我耳根上低声細語地說：“老孙啊，好消息，不知誰这么大头，跑到长辛店給咱們穷哥們开了个学堂，白念书，还管紙墨笔砚……”

我半信半疑地說：“什么学堂？你別作梦，哪有那样的美事。”

“这是真事。說瞎話，你割我的舌头。走吧，咱們下班瞅瞅去。”

下了班，我們湊上几个人，提着飯罐子就去了。学堂設在离工厂南門不过一里路远近的祠堂口里，一幢普通的平瓦房，門口儿挂着牌儿，写着“劳动补习学校”六个大字。我

們走進了小院，三間東房里圍坐着一群和我們一樣滿身沾着油泥的工人。兩個學生模樣的人，正在和大伙兒聊天談笑，見我們來了，連忙站了起來，給我們找凳子、找書，待我們可親熱了。一個伙友給我們介紹，他兩位是北京大學來的老師。從這天起我就進了這個學校，開始念書認字啦。吳容滄老師教我們班，他講課講解得非常清楚，說話對我們工人的口味，道理講得也對我們的心思，簡直使我入了迷。每天下了班我們就留在學校里，慢慢地我們開始認識了革命鬥爭的道理。我還記得，在講課時，老師常常結合着課本講解工人為什麼受窮受困。有一天，講“工人做工劳动”，提到工人最偉大，我就轉不過彎兒來，心想，偉大還受窮？他說：“你們想想，鐵路是誰修的？火車是誰開的？機器是誰造的？工人不蓋房，就沒處住，工人不織布，就沒衣穿，哪點也離不了工人的劳动。沒有工人劳动誰也活不了。”“那麼工人為什麼受窮？”吳老師就說：“你們大家想想，你想點，他想點，就想出來了。”每周還發一張“劳动周刊”小報，上面淨是咱們工人的事，介紹許多地方罢工的消息，還有外國工人運動的消息。看不懂的地方，兩位吳先生，就翻來復去地給我們講。我記得有一次吳老師跟我講一個打虎的故事，他說：“山上老虎稱王，誰也不敢惹它。可是人多了聯合起來，一樣能擒住它。”就這樣給我們傳播着革命鬥爭的思想。真是蠟不點不明，燈不撥不亮，這些簡單道理把我們心上的烏雲吹散了，我這個木头心眼兒也鑽透了，再不迷信那些工人生來命苦，八字注定的鬼話啦。後來，到這里念書識字的人越來越多了。不久就在這個學校里成立了工人俱樂部，里边有單弦、胡琴、八角鼓等樂器，還有報紙、棋子等。每天下工後很多人來到這里吹吹打打，說說唱唱，真比小戲園子還熱鬧。後來一傳

十，十傳百，人越來越多了，就連工頭也有參加的。工會就這樣秘密組織起來了，選出了委員，設立了教育、會計、秘書、庶務等部門，展開了活動。那會兒我們都是大老粗，斗大的字認不了半升，那些買賣人都說我們“拙嘴笨腮大舌頭”。為了練習說話，俱樂部很快地就組織了講演團，自願報名參加。我也上過台，模仿別人，叨咕幾句：“全世界無產階級苦難弟兄們”、“全國同胞父老兄弟姊妹們”……經這樣練習，後來許多人竟能站在人群里講上幾句，有的還被選為交際委員。我們年青力壯的小伙子，還組成一支糾察隊，聲勢非常浩大。

問題也就這樣發生了。俗語說：“家賊難防。”工會的各種活動，不知道廠里怎麼竟知道得清清楚楚。廠里的反動頭子們還嚷嚷：“誰加入俱樂部就統統開除。”工會的領導人連忙召開會議，進行調查，發現是翻砂場工頭鄧長榮賣了底。他向工廠反動頭子獻計獻策，阻止工人去俱樂部，破壞工會，還自吹“我鄧長榮一跺腳，廠子亂顫”。這小子要拆我們的台呀。他還在外頭找碴打人。大伙決定狠狠地揍他一頓。一天傍晚，我和王俊、吳容滄等按預定的時間集合在工廠南門外的小橋上等候他，商量好王俊先去揪他，咱們再上手揍他。正商議的時候，工廠汽笛響了，工人們都紛紛地走出工廠。這時，鄧長榮邁着小方步也從工廠出來了，他身穿半新的青布短褂，高揚着臉，兩撇仁丹鬍子，神氣十足地朝橋頭走來。他剛過鐵道，王俊就一個箭步把他脖領子給揪住了，只听一聲吶喊：“揍馬屁黨呀！”我們幾個人就圍上去了，腳踢拳打，這時下班的工人聽說打鄧長榮，也忘掉回家去吃飯，手拿劈柴、木棍、石頭一擁而上，打得鄧長榮抱頭亂兜圈，最後被我們推到臭水溝里，像個夾尾巴狗似地逃跑了。這下子大

伙可出了气。打完邓长荣以后，加入俱乐部的人更多了，为了保护工会，决定凡是当工头当先生的一概不要。不久，工会一下子就增加到三千多人。人多得小院子简直盛不开了。后来俱乐部又迁到大街刘家大院里，那里又叫刘铁铺，就是我们工人活动的司令部。

一九二二年八月，我们在工会领导下，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提出八小时工作制、短工改长工、增加工资、盖宿舍等九项要求。当时厂主和反动军阀勾结一起，对我们的九项合理要求，置之不理，反而在厂里嚷嚷：“罢工就没窝头吃。南门挂上个窝头，北门挂上个窝头，看你们罢工不罢工！”好吧，你把窝头挂在门上，我们早就把窝头穿在绳上，掄着干了。怎么也是挨饿，不答应，我们就罢工，咱们一块饿肚子吧。当时我们的生活真比黄连还苦，一天干十小时的工作，工资不是拖欠，就是不发，十几年的短工不换长工。每月七、八块钱，全家子五、六口人，连粥都喝不饱。当年有这么一句话，形容工人的生活：“当当买藕吃，口口是窟窿。”就这样，我们还是等着北京路局的合理答复，一天一天过去了，没有信儿。

就在八月二十四日的早晨，从刘铁铺发出了罢工的命令。我们马上行动起来，机器停了，锅炉灭了火，十人一小队，一个分场一大队，打着请愿的大旗，浩浩荡荡走出工厂南门，上千号的人聚集在娘娘庙里开会通过罢工纪律。决定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决不复工，团结一致，坚持到底。接着一阵呐喊：“工友们！到车站截车去！”一阵掌声，小旗刷刷挥舞着，各队都行动起来了。我们纠察队手拿着榔头把，跨出了娘娘庙，直奔长辛店火车站，臂靠臂，手挽手，就像一群猛虎似的。纠察队把守着道口和车站，探信队跑东跑西打听消息。

长辛店車站上挤滿了我們的人，成群結队并肩站在鐵道上，拦截南來北往的火車。來一趟我們截一趟。火車一停，兩三個人馬上跳上機車清爐，兩個人跨上車尾，去摘鈎，一列一列的火車都截下了。我們的講演團打着小旗一面向乘車客人宣傳，一面幫助路遠的找店，幫助路近的雇小毛驢和小轎車回家。就在這個時候，從南方開過一列兵車，滿車是大兵，一個個手托着上刺刀的大槍，車頭上還架着一挺機槍。大伙兒一看就紅了眼，齊聲吶喊：“沖上去！”糾察队和几百名工人都躺在鐵道上了。火車被迫停下了。我一翻身就爬上了機車，把車鈎給摘了。幾個人跳上司機室，把車頭開進火車房，清爐消火。我們的講演團向大兵宣傳開了。有些當兵的听了我們的悲慘生活，也掉淚了。听到后来，他們把刺刀也摘掉了。一列一列的火車堵塞在长辛店車站，整個京漢鐵路運輸中斷了。敵人沒办法，不得不答应我們提出的九項条件。这次罢工胜利了。全路員工都增加了工資，实行了八小時的工作制。工人俱乐部的聲勢越来越大了。團結在工会周圍的人更多了。

敵人看到我們越来越團結，參加工会的人也越来越多，害怕我們再罢工，就想法儿破坏工会。他們知道明爭不過，就和我們暗斗。我們糾察队和探信队也格外加着小心，保护着工会。不久，我們的执行委員王俊去苏联学习，不想交际委員謝德清，借着去北京交涉事，常往赵局长那里跑；慢慢地这小子就变心了。会里决定个事，他总是跟我們牛蹄子兩瓣着，两条心。工会决定去北京天安門前开庆祝罢工胜利会，他却拉走一批人去逛天桥。后来他还欺騙工人，說誰入他那个工会，每人每天长兩毛錢。后来，我們調查出来了，他当了赵继賢的走狗！赵继賢收买了，他把工会的底都給出賣

了。

一天早晨，西北風剛停，外面的冷氣还很逼人，和我一块干活的探信隊員李兴旺，瞅見謝德清從北京回來了，可是沒到工會去。工會委員陳立茂要李兴旺、郭連登等人去他家請他到工會來。他們順着馬路直奔趙幸店去找他，路上幾個人商議着防備他有傢伙。郭連登會武術，他告訴李兴旺：“你們在旁邊放哨，動起手來再上去揪他，今天刀割了脖子也不能放跑他。”他們順着鐵路各自揀了幾塊石頭裝在兜里，以防萬一。正往前走的時候，謝德清身穿青大棉袍，頭戴馬虎帽，端着肩搖晃着腦袋，迎面走來了。不細瞧真認不出來了。郭連登緊走了幾步，很客氣地對他說：“謝先生，史委員請您去開會。”謝德清把三角眼一翻說：“去，去，去，我沒工夫，會里沒我的事。”“您沒工夫跟我說一下。”“你們算干什麼的，沒工夫答理你們。”這時李兴旺一旁搭話了：“真他媽的鼓樓上掛肉，好大的架子。今天拉也得拉你到工會去。”謝德清瞧大伙圍上了，右手一撩棉袍下開襟，把手槍拿出來啦。郭連登手急眼快，一閃身向前一個箭步，右手拖住了謝德清的腕子，“當……當……”槍口沖天響了。李兴旺、吳禎就圍上去，拿起石頭拋他的腦袋。謝德清一瞧事情不妙，掉轉屁股就逃，郭連登後邊緊追。真是狗急會跳牆，謝德清這小子腿快，一窩跳過菜園的土圍牆，郭連登邊追邊喊：“你小子鑽過鼠洞，也得掏出你來。”郭連登一縱身也跳過圍牆，緊緊追住謝德清的身影。謝德清穿過小胡同一溜煙跑進憲兵隊。郭連登被憲兵門崗攔下了，不准進去。“不行！把工賊謝德清交出來！”郭連登、吳禎沖了幾次都被阻住，我們糾察隊知道後，馬上把憲兵隊圍上了，堅決要人，憲兵隊不肯答應。人多主意多，不知誰出的好主意，先讓謝德清出來，咱們給他照個像，讓

他“揚名”全厂。宪兵队看大家的气势很猛，才把謝德清拉出来，让大伙給这个坏蛋照个像。正在这时候，厂里下班汽笛响了，工人们聞声都赶来了。密密匝匝地把宪兵队圍个風雨不透。大家齐声呐喊：“把謝德清交出来！”門崗横着枪把，阻拦着不让我们进去。人怕齐心，虎怕成群，人多势众，大伙趁着这两个門崗防守不及，一拥而上，把宪兵队大門推掉了，冲了进去，抓住了謝德清，像老鷹逮小鸡一样給揪出来了。大伙圍上去你一拳他一脚的，打个开鍋烂。我挤了老半天才狠狠地捶了他两拳，大伙拉着他两条腿，像拉死狗一样把他拉到刘鉄鋪。謝德清被打得鼻青臉肿，躺在工会院里，渾身打哆嗦，向我们哀哀求饒。

第二天，打工賊謝德清的告示貼出来了，那張狼狽丑像的照片，也貼出来了。这一天一进厂門大伙儿就把这張告示圍上了，有的說：“应该給他腦門儿上刻上‘工賊’二字，以后好让大伙儿認識他。”有的說：“給他登在报上，让他遺臭万年。”大伙你一言我一語的，真是大快人心。

正在这时候，法国厂长祚曼手持文明棍，礼帽西服，脖子系着白領带，两只尖皮鞋黑得发亮，神气活現地走来了。大伙一見“老帮子”来了，就散开了。这小子，过来就把这張告示和像片撕毀扔在地上，还找总管大发脾气說：“我这个告示牌不准別人往上貼东西。”下班我們到工会一商量，要揍他。工会委員阻止大家：“咱們先不揍他，咱們想一种文明的办法对付他。”第二天，上班以后我們正干活，祚曼厂长和往常一样，翘起他那两撇灰白的小鬍子，翻瞪着黃眼珠又串場检查工作来了。剛一进我們机械場，大伙互相使个眼色，馬上把車床停了。大伙抱着臂誰也不干活，瞧着他。开始他楞住了。他扫了大伙一眼，嘴里叨咕着洋文，往場房里边走，

我們却来个“散戏吹喇叭”往外走，祚曼离开了場房我們就干。全厂一致行动，祚曼到哪个場，哪个場的工友就这样对付他。我們的口号是不攆走祚曼我們决不罢休，就用这个方法終于把外国厂长祚曼攆出了工厂。我們管这次行动叫做文明罢工。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京汉鐵路总工会正式在郑州成立，各地工会选派代表參加庆祝，我們选派了工会委員史文彬等人去郑州，罢工的風暴就是从这儿引起的。

这一天，会場上張灯結采，全路代表喜气洋洋地正走入会場的时候，突然来了一批全副武装的軍警，包圍了会場，阻止代表进入会場，軍警用枪威胁驅逐代表离开会場，砸毀了“劳工神圣”的大匾，軍閥吳佩孚还指令他的爪牙郑州市卫戍司令黃殿辰、副司令馮云下令全市戒严，不准代表随便通行，飯館不卖飯，代表們都餓了肚子。

总工会立即召开紧急秘密會議，让代表馬上各回原地，听候指揮，坚决跟軍閥斗争到底。

三日，我們的代表回来了，在厂外廣場上召开了全体會員大会，史文彬手拭眼泪，向我們报告了軍閥破坏总工会的情景。我們越听越气愤，不約而同地怒吼起来：“軍閥太欺負人啦，我們罢工！罢工！”震天动地的口号响成一片。史文彬嘶哑着嗓子喊着：“工友們！我們要抱成一团，一条心，跟他媽的軍閥干到底。”又一陣喊叫：“对！对！坚决干到底。”史文彬又嘱咐大家：“不要乱动，我們要听从总工会的命令，大家注意着信号。”

四日早晨，我們頂着星星又照常走进工厂，大伙的心早就变了，誰也干不下去活，我們开着車轉，不吃刀，等着罢工的命令。大約十点钟，我們的队长崔玉春，手拿着小白三

角旗，走进場房冲我們一晃，我們馬上关了車，走出場房，整队出厂。白旗到哪儿，哪儿就停止了工作。鍋炉工人清炉灭火，烟囱不冒烟，机器不轉了。頓时工厂显得一片寂靜，只有那些工头、总管惊慌失措地守在厂里。最后也被糾察队轰出了工厂。

工会委員史文彬宣布总工会罢工命令，罢工开始了。我們糾察队臂带紅袖章，把守工厂、路口、工会，調查团衣領上别着小別針，到处探听情况，注意反动派的动静。大家要求把凶手黄殿辰、馮云脑袋摘下来，把匾給挂上，不答应决不复工。震动全国的京汉鐵路大罢工的風暴吹遍全国各地。各地工会都拍来电报支持我們这一正义斗争，整个京汉鐵路全部运输停頓了。

我們天天守着工会的大門，工人們随时随地都聚集在工会里，和軍閥坚持斗争。罢工的第三天（六日）下午，不知哪陣風把宛平县县长湯曉秋給刮来了，大家一看，就猜疑地說：这老小子一来，是夜猫子进宅，凶多吉少。这一天我正在工会站崗放哨，看这老小子戴着青帽壳，长袍緞子馬褂，鬼头鬼脑地走进工会办公室，大家馬上警惕起来，圍上了办公室，有的爬在窗台上往里看，有的堵住門口瞧着他耍什么花招。工会委員史文彬让他一个座位，湯曉秋装出一副假仁假义的面孔問：“史委員，大伙儿要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我去給大伙儿办，有什么事跟我說。”我們史委員話說得干脆：“条件很简单，砸毀我們的匾給挂上，把凶手交出来，不准干涉工会活动……”湯曉秋搖晃着脑袋說：“这条件太……还是复工吧，你們要求长工資，我去跟你們局长說去，……”“去你的吧，我們要人权，要自由，要砸匾的暴徒，不要錢……”大家齐声喊嚷。湯曉秋有点惊慌，忙着站起来，摆动着手：

“唉！我这是为大家好，別把話說死了，在我这地面上鬧出事來，不好看，我也担当不了……”“誰听你这套鬼話，滾吧！用不着你担当。”不知誰喊了一嗓子，瓮声瓮气地：“別廢話！再說，用草紙把你捏出去！”接着齐声呐喊：“滾吧！滾出去！”湯县长弄个大窝脖，臉色一紅一白的。还找补一句：“那好，既然大家不賞給我这个面子，出了事我就不負責了。”大家譏笑地說：“滾吧……”我們糾察队让大家閃个道儿。湯县长就这样灰溜溜地走了。

真沒料到：就在六日的深更半夜，來了一批軍隊，全副武装，把长辛店給包圍了。四下狗咬，喊叫……把寂靜的夜晚，鬧得非常杂乱。

那天夜里漆黑，对面看不见人，我赶忙翻身爬起，披上棉袄就闖了出去。我們家里的拦住我說：“不行！光棍子不吃眼前亏。你还是躲躲吧！”“怕什么！‘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我說。

七日的早晨天剛亮，我就跑到工会，这时工会門口聚集了上千的人，互相探听着昨夜里抓人的消息，誰也說不清楚，一会儿，探信队摸到底了，悄悄地傳遞着消息。昨夜里十四混成旅把咱們委員都抓走了，吳大脖子（吳禎，已牺牲）也被綁走了，他大闺女看見是謝德清这小子带着大兵抓走他爹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时我們糾察队大队长葛树貴，光着头身穿青布短袄，从工会院里跨了出来，右手拿着大錘把，左手还拿着一張卷着大葱的烙餅，大伙一看大老葛來了，大家緊張的臉一亮。他斜楞着身子，一脚站在台阶上，一脚登在門坎上，口里的热气在他眉上結成一层冰霜，咧开嗓門說：“工友們！我們的工会委員給抓走了。我們決不屈服，一定坚持罢工。走！上火神庙（警察局）要人去！不給人咱們砸他

的牢門，一定要把我們的委員要回來！”一陣吶喊：“走哇，要人去呀！”我緊跟在大老葛身旁，保護着他，怕受人家的暗算。左世俊也緊隨在后邊。俱樂部離火神廟不遠，我們正往前沖的時候，從火神廟里拉出兩排士兵，手托着上好刺刀的大槍，雁別翅一樣，背靠背杀气騰騰地瞅着我們的行動。我們向他們要人，他們不給，倒開了槍。大老葛高聲喊着：“工友們，我們前進，沖上去！他有槍我們有血，血債得血還！向前沖！打死一個有十個！我們決不后退！”邊喊邊往前面沖，只見一個當官兒的用指揮刀一揚，“咔……咔……咔……”槍聲響成一片，槍子擦腦頂上飛過去了。這時我們心里像團團的大火燃燒一樣，大老葛一斜身就直奔大兵去了，我緊跟着擠了過去。這時又一排子彈沖我們打來，我一斜身趴在地上，子彈從我前襟穿透兩層棉襖，幸亏沒有受傷。這時葛樹貴正倒在我身旁邊，嘴里直噴鮮血，我們隊長受傷了。我拉了他一把，一點沒動。趁槍剛不響，我翻了一個身三步并兩步竄進了全興號糧店，躍過他的院牆，跑到家里。家里以為我被打死了，見我回來又驚又喜，趕快給我找棉袍，把我打扮得像個商人模樣。我摘下、收好糾察隊和工會的証章，轉身又跑到全興號和左世俊、韓寶榮、閻岐榮等搶救大老葛。我們用了五六塊手帕和撕下來的布條給大老葛包扎上，並且找來一個大筐籬，把大老葛放在筐籬里抬着。可是各道口都有大兵把守，好不容易通過了十幾道卡子，才來到工廠醫院，可是大夫拒絕醫治，抬到家不久大老葛就咽了氣，留下了雙目失明的母親、老婆和四個孩子。

我們懷着強烈的憤怒和悲痛的心情，埋葬了這位為了工人階級利益貢獻出自己生命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如今大老葛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三十多年了。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推翻

了旧的統治，建立了嶄新的国家，如今正大踏步地建設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迈进，咱們工人階級成为国家建設的領導階級。回想起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回想起大老葛那种忠于工人階級事业的英勇动人事迹，永远使我們怀着无限温暖同崇敬心情。大老葛将永远活在我們的心里。

## 地 下 的 斗 爭

刘月奇 張廷瑤

一九四四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保定城市工作委員會的领导下，我們在厂子里正式成立了一个地下支部，一共有三个党员：客車場的張廷瑤和李恒儉、鍛工場的刘月奇。

我們三人，都是从保定南边老解放区来的。早就受到了共产党的教育。張廷瑤在冉庄村担任过儿童团团長，刘月奇是楊城村的儿童团团長，李恒儉也是冉庄村的人。一九四二年左右，日本鬼子发动了几次大扫蕩，对解放区进行了疯狂的騷扰，在各村建起了炮楼。同志們临时轉移到山区去了。我們找到老乡的关系，先后来到了长辛店。

我們到了长辛店，想尽了办法，給工头送了礼，算是都上了工。有了站脚的地方，我們就开始活动了。最初，我們还都是党的积极分子，单独地跟村里党组织发生关系。

### 到解放区去

刘月奇的主要工作，是給解放区带东西。說起給解放区带东西，可不容易。从长辛店到保定，全是敌占区，带东西往解放区去，就必须要通过这道很严密的封鎖綫，道儿上走着，不知哪会儿，冷不防从高粱地里钻出一个伪軍来。有一点儿弄不好，就会被抓起来。但是任凭敌人多么厉害，咱們

也有办法对付他。有一次，村里的党团组织要刘月奇搞一批皮带、枪套、自行车带等，刘月奇接到了任务以后，先到北京天桥买了一身破呢子军官服和一双破皮鞋。回到家里，就把皮带、枪套等缠在腰里，外边穿上那身破呢子的军装，脚上穿着那双虽然破点儿可擦得净光的皮鞋，就这样上了火车。他是个大高个儿，身子骨儿又挺魁伟，脸盘子也挺大方，把这身呢子衣服穿上以后，没人敢招惹他，小警察子们看见以后，还都给他鞠躬呢。车到了方顺桥杨旗外，刘月奇一扭身就跳下了火车。换上便衣以后，就按着指定的接头地点——许村土窑那儿去了。这时，天已经黑了，地里作活的人群已经收工了，只看到土窑那儿，还有三个耨地的人，刘月奇就奔他们走了过去，把一个预先约好作记号的红包袱扔在地里。刚接近那儿，那三人立刻把锄一戳，笑嘻嘻地就奔刘月奇跑来了。刘月奇抬头一看，一个也不认识，但早知道这就是党组织派来接他的。除了往解放区带东西之外，刘月奇还按照党的指示，联络工人，扩大宣传。他以跑买卖为名，组织了工人何凤亭、高曙岩、常安等十多个人，一起到解放区去。到了解放区以后，村干部亲切地接待了这些工人，和他们讲了许多解放区的事儿：解放区人们吃什么、穿什么，工人们怎样又学文化、又唱歌，他们干起活来劲头又是如何冲，军民一家，人人快乐等等。工人们越听越觉着新鲜，心里很受感动。回来时，又给他们办了通行证，用大车帮他们往回送粮食。他们就这样经常往解放区去。每次去都受到教育。回来以后，他们就暗地给其他的工人们介绍解放区的生活情况。

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日本鬼子快完蛋了。保定城市工作委员会在解放区的冉庄村（张廷瑤家就在那里），设了一个城

市工作訓練班，我們都先后參加了。

這個訓練班設在冉庄村北的一所學校里。五間穿堂屋，全都用布帳隔着，進去以後，誰也看不見誰，只知道屋里有不少人，聽見有人講課。小帳子屋里有煙、有茶水，悶了就抽煙，渴了就喝水，該活動了，都得按照指定的路線去活動，一出門就鑽了高粱地，回來時誰也見不着誰。這次學習，主要是給我們講了些農村土地革命的事情、前綫戰鬥的勝利消息、國內外工人鬥爭情況，講到了如何聯繫團結群眾，如何了解調查敵人情況等。

學習回來以後，我們工作搞得更活躍了。我們在保定城市工作委員會的培養下，分別於一九四四年前後參加了黨的組織，又在一九四五年五月成立了地下支部。

### 巧鬥敵人

我們在長辛店蔡寶生家賃了三間房。蔡寶生當時在浴池工作，認識的人多。我們住在那兒，就拉攏了一些人來聊大天。為了工作，我們還和一些入拜了盟兄弟。利用各種機會，團結群眾，打擊敵人。

快到開支了，我們就盤問盟兄龔繼昌，打聽國民黨軍隊抓兵的事。因為他父親當時是偽甲長，每到開支時，就要向大伙兒斂兵錢。我們得到抓兵的消息以後，一面向上級匯報，一而就對工人們側面進行宣傳：“開支還不夠兵錢呀！想辦法躲躲吧！”工人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就一傳十，十傳百地躲開了，有的人躲在外邊去了，也有的人躲在廠里不回家。這樣使工人們大伙不去給國民黨反動派當兵，破壞敵人的抓兵。

又有一次，偽工會的張順，假惺惺地關心起工人來了，

說給工人們到北京去要开支（因为国民党老是不給工人开支工錢）。他向工人們斂了盘費就去了。回来以后，跟他一块儿去的韓德珍嚷嚷开了：“他媽的！哪是去要开支去了？！到北京吃了一頓儿回来了。”我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支部馬上开会进行了分析研究，知道伪工会的張順这小子到北京把个韓德珍給甩了，他把工人給的錢自己独吃了一大頓，所以回来以后，韓德珍气不平，就給張順嚷嚷开了。我們抓着了这一机会，馬上把这事实对工人进行揭露。工人群众中，一傳十，十傳百，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全議論开了，正在干活的工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馬上就气愤地把工具一摔，不干了！到处酝酿着对国民党和反动工会的不滿。不久，工厂里群众性的餓工运动就爆发了。

我們还了解了厂里敌伪組織的好些情况，向上級党汇报。

### 宣傳战

因为鉄道不通，我們有一时期沒能回解放区去。国民党的活动却又猖狂起来。这时，忽然收到了一封信。

廷瑤表兄：

……近日未曾回家，表弟放心不下，你那棉衣早該带回拆洗了，望下次回家带来。

你那儿的生活有困难嗎？我想让你表弟張建去你那儿摆个烟摊，好帮你維持生活……

表弟××1947年 月 日

念完来信，大家都欢喜起来了。“这回好了，組織上多么关心咱們呀！”原来这是上級党写給我們的信。

我們的工作是越干越有劲儿，我們的住地成了宣傳陣地。

范登科、李有年……等十几名工人都住在一起，我們就大力對他們進行宣傳教育，把國民黨的腐敗，給大伙兒講得一清二楚，大伙兒聽了以後，都說：鬼子的尾巴，長不了啦，大伙兒干活就更稀鬆了。

劉月奇常常帶着一些工人去打魚。利用打魚休息的時間，坐在沙灘上給大伙兒講解放區的事兒，和國民黨腐敗的情況。

這時，國民黨的反動宣傳也加強了。一天，國民黨二〇八師的師長，在工廠轉盤道召集大會，把工人們全給逼去了，四外全站上了崗，軍隊包圍上了，支起了機槍；聽也得聽，不聽也得聽。把工人們全聚來以後，國民黨師長開始講話了，他說：“……共產黨共產共妻亂搶大閨女，一個牛子牌劈開一扔，人們就亂搶，搶着誰給誰，對上就是兩口子……還有，或者是弄個大圓圈兒，把大伙兒放在裏頭，亂摸腳，摸着誰，誰就是誰的老婆……共產黨淨活埋人……”在會場的旁邊還挂着反動宣傳畫。

大伙兒聽了以後都不信，但也有那半信半疑的。會後，三個一群兩個一伙地邊走邊議論：“那傢伙說話怎麼那麼孫子呀！莫非他家沒姑娘姐妹呀？”“那要摸住他奶奶的腳怎麼辦呀？”“唉！要叫我看，半夜你就別聽這牛叫喊，淨聽這，你們兩口子都快分家來呀！”……

我們三人也就分頭鑽到人群里去參加議論，大伙兒一見我們就說：“哎——廷瑤，你是解放區的人，你說：有這回事沒有？”廷瑤說：“要有這事兒，我早就不打光棍了。這是母豬作單離瞎編！他媽的，一天吃飽了沒事，淨拿窮工人來打哈哈！……”經我們這樣一說，大伙兒半信半疑的勁兒一下就打通了。國民黨費半天勁，叫喊半天，在工人中一點作用也起不了。

我們還自己編詞，進行宣傳。詞編好後就找個僻靜地方去寫。當時客車場北邊地方比較偏僻，國民黨的頭子們很少往那邊去。我們就偷偷地在牆上寫標語：“國民黨是攔扒匠，欺壓工人不象樣，工人成天沒吃喝，攔扒匠們吃得肥頭大耳滾瓜胖！”還有時候畫個大肚子人捏着工人的頭，下邊還寫上幾句話：“國民黨大肚皮，欺壓工人不講理，開腔瞪看看你們的肚油吧！問問肚油是哪來的！”我們寫完了以後，就去人群中打聽。工人們看了以後，心里都覺着挺解氣。

## 岭南工作队的故事

孙兆武说 王文明整理

日本投降后，“晋察冀边区城市工作部”从阜平迁到京西香山一带，领导这儿的城市工作。具体领导长辛店地下工作的是“晋察冀边区城市工作部长辛店工作委员会”。为了使机关不致被敌人发现，工作更秘密一些，有时也用代号“一支队”或“二支队”。后来由于活动频繁，就定名为“岭南工作队”。我们的工作主要对象是工人，活动内容除了了解敌情和厂方情况以外，还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如开小座谈会，散发解放区小报、书刊等。这些工作，全是采取很秘密的方式进行的，我讲两段小事：

### 买柿子

岭南工作队的人来长辛店找工人谈话来了。来谈以前，都得先约好了接头的时间和办法。办法是这样：被访者（工人）必须按指定的路走，并熟记暗号；来访者（工作队的同志）在一定的地方等候，双方必须知道对方的外貌口音，两人相遇后，先讲暗号，以便确定是自己人。被访者按规定带有大柿子或小柿子，用篮子提着，来访者走过去拿出被访者的大柿子说：“这个柿子有半斤重？”对方回答：“两个可能有一斤”。这就说明都是自己人，可以交谈了。如果带的是小柿

子，來訪者就問：“今年的柿子這麼小？”被訪者就答道：“我專賣小的。”這也說明是自己人，於是就可以接頭了。被訪者就把來訪者讓到家里，以多年未見的親友相待，鄰居也不知道是幹什麼的，隨後，就開始訪問工作。

## 賣菜

在大路上，有個菜販擔着兩滿筐大白菜急急走着，筐又大又深，一担足有百來斤。他像是來給買主送菜的，並不叫賣，只擺着胳膊，大步往前趕，扁担上下彈動，成為弧形。他來到長辛店街口，把担子放下，喘了口粗氣，就慢騰騰地擦起汗來。看樣子顯然是從遠道趕來的。

不多一會，來了個買菜的，他問道：“菜是賣的嗎？”“你要就賣。”“那好，我全要了。”於是，買菜的头前走，賣菜的隨後跟，轉彎抹角進了一條小巷，來到家里。進屋之後，買菜的笑着說：“老孫，今兒個又叫你倆受累了。”“沒什麼，就是差一點叫人家給買去。半道上，偏碰上了個‘伙伙’（國民黨軍隊里的炊事員）非要買我們的菜不可，我好說歹說，才算蒙過去了。”老孫一邊說，一邊往外拿菜，拿掉兩層菜，筐底下便露出一捆捆的書報來。“這是五百份《晉察冀邊區報》，這是二百本《七俠五義》，這是一百本《三國演義》……”老孫笑着報數，並且說：“老葉，下回就是《三俠劍》了。”老葉打開一本《三國演義》，笑着說：“你看，諸葛亮也幫我們的忙了。”

一切弄妥之後，老孫就挑起空筐走出門去，老葉送到門口，大聲說：“下回多帶些油菜來！”

明天，《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評中國之命運》，就通過地下黨秘密召集的座談會散發到工人和進步的職員手里，後天，在街頭上、廠房里、機車上就都貼上了我們

的《晋察冀边区报》，上面登载着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同时伪厂长贾象乾和伪工会主任李金堂也在署名“一支队”的信里收到了这种小报。

